臺大歷史學報

第六十五期

臺灣白銀流動與貿易表現（1865-1895）

陳　計　堯

抽印本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編

中華民國一〇九年六月

臺灣・臺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大歷史學報第 65 期
2020 年 6 月，頁 115-168

BIBLID1012-8514(2020)65pp.115-168
2019.7.29 收稿，2020.3.11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2006_(65).0004

臺灣白銀流動與貿易表現（1865-1895）

陳 計 堯*

提 要

臺灣近代經濟史過去多聚焦在商品貿易、個別產業、貿易網絡以及國家政策對貿易表現的影響，至於臺灣經濟史中的白銀問題則尚未被充分重視，特別是評估白銀在貿易表現的角色。本文旨在透過檢視清帝國時代臺灣海關文獻，重新評估當時開放對外國通商的「條約港」範圍之貿易表現。

本文分析臺灣從 1865 年開始對外國開港貿易至 1895 年日清戰爭結束為止的貿易數據。從這些統計資料可知，當一併考慮白銀的價值與流動時，島上的貿易結構不可單以島內南、北作對比，應勾劃臺灣島內、外多重的貿易與資本移動背後所隱藏的南北不同經濟結構。

關鍵詞：白銀　黃金　貿易表現　資本帳　海關

*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701401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E-mail: kaiychan@mail.nck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 言
一、南、北臺灣對比原論
二、金價波動與臺灣白銀
三、白銀：作為商品與資本
四、白銀流動：方向與差異
五、回歸資本帳
結 語

前 言

過去關於近代臺灣經濟史的討論，無論是清治時期抑或日治時期，對於商品貿易尤其關注。這些討論重視臺灣總體貿易的表現，以及個別重要商品與相關產業的發展，也有針對局部地區的貿易網絡與產業型態進行研究，成果可謂豐碩。透過這些貿易與產業史的研究，我們可以觀察到臺灣個別商品對整體貿易表現的影響，以及商品與個別地區相關產業的連動關係。[1]此外，因應臺灣的海島貿易型態，海上交通（航運）的發

1 例如：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History, People,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Prospects, Tea, Camphor, Sugar, Gold, Coal, Sulphur, Economical Plants, and Other Productions* (London: Macmillan & Co., 1903 /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reprint, 1992), pp. 102-274; 林東辰，《臺灣貿易史》（臺北：成文出版社，1999 重印本），頁 169-192；矢內原忠雄，《帝国主義下の台湾》（東京：岩波書店，1988），頁 30-33；東嘉生，〈清朝治下臺灣の貿易と外國商業資本〉，《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政學科研究年報》第 3 卷（1936，臺北），頁 319-396；Robert Gardella, “From Treaty Ports to Provincial Status, 1860-1894,” in *Taiwan: A New History*, ed. Murray A. Rubinstein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 pp.163-200; 李祖基編，《近代臺灣地方對外貿易》（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頁 198-204；林仁川、黃福才，《臺灣社會經濟史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1），頁 200-206；Man-houng Lin, “Economic Ties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1860-1895: Strengthening or Weakening?” in *Tradition and Metamorphosis in Modern China, Symposium in Commemoration of Prof. Liu*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展也成為近代臺灣經濟史中的重要課題，使我們對於臺灣從晚清開港至日治時期前半的海上交通，從遠洋貿易到區域往來的結構，得到一定程度的瞭解。[2]更有甚者，研究者根據「開港」時代的貿易表現（貿易值）與航運載量等數據分析，以及所帶動的人口移動、商業變化等，推論臺灣「歷史重心之北移」。[3]

然而，有關「歷史重心之北移」說的近代臺灣貿易史研究，對於與臺灣經濟史息息相關的白銀問題，卻缺乏深入討論。誠如雷麥（C. F. Remer）早在 1920 年代中期已指出，在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世界金價長期上揚的過程中，清帝國以白銀計價的出口金額受到刺激而增加，並因而減少進口金額，結果部分地改善了貿易收支。[4]戰後更有學者李泰初質疑，近代海關官員利用隱瞞海關貨價與白銀匯率等資訊，可能方便官員利用關稅收入對列強還款作準備。[5]濱下武志亦指出，近代世界經濟因為金價上揚而導致銀價下跌，使得歐美各國把白銀以各種形式（尤其是銀圓）運往持續使用白銀的地區（亞洲），更加強亞洲國家（尤其是清帝國）「銀貨圈」的結構。[6]而郝延平對於 19 世紀在清國商業史中，出現大量世界各國鑄造、發行的銀圓流通情形，形容為一場「商業革命」

Kwang-Ching's 75th Birthday, ed. Hao Yan-p'ing and Wei Hsiu-mei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1998), pp. 1067-1089, particularly p. 1086;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頁 191；林玉茹，〈從屬與分立：十九世紀中葉臺灣港口城市的雙重貿易機制〉，《臺灣史研究》第 17 卷第 2 期（2010 年 6 月，臺北），頁 1-37；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中和：知書房，1996），頁 261-317。

2 戴寶村，《近代臺灣海運發展：戎克船到長榮巨舶》（臺北：玉山社，2000）。

3 關於「北移」論，見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頁 180-188。

4 C. F. Remer, "International Trade between Gold and Silver Countries: China, 1885-1913,"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40, no. 4 (Aug. 1926), pp. 597-643.

5 李泰初，〈有關中國近代對外貿易若干問題之商榷〉，《珠海學報》第 2 期（1964，香港），頁 174-287。

6 濱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頁 49-76。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重要成分。[7]顯然，對於既是東亞區域的成員之一、又在清帝國統治下的臺灣來說，白銀的匯率波動及其流動等問題，有其重要性且尚待進一步理解。

白銀貨幣在過去臺灣近代貨幣史已有所研究，大多針對白銀貨幣的源流、種類、成色，以及相關的錢幣學與貨幣制度之史事進行討論。[8]此外，白銀貨幣問題也常被放置在日治時期金本位改革的討論中，論證臺灣人如何改變貨幣習慣等問題。[9]這些研究固可讓讀者從微觀角度，觀察臺灣社會使用白銀貨幣習慣的歷史演變，但對於晚清開港時期依然存在的白銀貿易在近代臺灣貿易關係上的重要性，卻難以提供一個宏觀的理解。

晚近學者也逐漸注意到白銀貿易在近代臺灣貿易關係上的重要性。筆者曾經針對晚清南臺灣的經貿狀況進行通盤分析，表明雖然在「條約港制度」（“Treaty Port System”[10]）下，從前的「廈門網絡」被香港取代，

7 Yen-p’ing Hao,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34-111.

8 袁穎生，《臺灣光復前貨幣史述》（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 1-141；曾澤祿，《臺灣貨幣的精神與文化》（嘉義：自刊本，2004），頁 1-162。

9 矢內原忠雄，《帝国主義下の台湾》，頁 30-33；北山富久二郎，《臺灣に於ける秤量貨幣制と我が幣制政策——銀地金を流通せしむる金本位制》（東京：巖松堂書店，1935），頁 107-283；東嘉生，《臺灣經濟史研究》（臺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社，1944），頁 100-104；周憲文編著，《臺灣經濟史》（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80），頁 406-407。另有專門論文討論貨幣觀念轉變的問題，見楊佳瑜，〈日治時期台灣幣制改革與台灣人貨幣觀念的轉變〉（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10 「條約港體制」（Treaty Port System）一詞的來源，可追溯至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的「條約制度」（Treaty System）研究。根據費正清的論述，清帝國與歐美國家處理雙邊的外交關係，是透過互訂條約而規範，讓歐美人士能在清帝國進行經商活動，活動地點則為特定通商地，漢文稱為「通商口岸」，近人稱為「條約港」（Treaty Port）。關於「條約制度」在清帝國的建立，詳見 John K. Fairbank, “The Creation of the Treaty System,”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2,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I, e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213-265. 條約港在中國的擴展，詳見 En-sai Tai, *Treaty Ports in China (A Study in Diplomacy)* (New York:

臺灣人文與科學期刊資料庫

主導商品貿易的地位，廈門反而在白銀流動上成為南臺灣最重要的夥伴，甚至吸收大量南臺灣的白銀；而且在商品貿易長期維持順差的情況下，白銀貿易出現長期逆差，導致南臺灣在晚清開港的 30 年裡呈現貴金屬流出的現象。[11]該文對於白銀貿易的論述，加深我們對於近代臺灣貿易表現的理解，但在研究的地域範圍上只涵蓋南臺灣，其更深層的意義需要更廣泛的區域分析始能獲得。

故此，本文欲對臺灣開始有貿易統計資料的「開港」時代（1865-1895）進行研究，闡明臺灣白銀流動與商品貿易表現之間的關係，從而把過去較為人忽略的白銀流動問題，放回臺灣近代經濟史的討論與理解之中。亦即，過去研究者所重視的臺灣南、北四個「開港通商」的「條約港」（Treaty Port，或謂「通商口岸」），[12]在並未涉及白銀流動的問題前，其商品貿易的表現如何？這些貿易表現在加入白銀流動的因素，又會出現何種現象？這些現象的背後，又如何讓我們重新理解臺灣南、北兩地在「開港」時代的貿易表現，甚至重新理解臺灣「歷史重心之北移」的論述？在此，我們必須強調，本文並非專注於全面地檢討臺灣「歷史重心之北移」的論述，因為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有更全面的檢討方式、研究工具、歷史文獻以及數據。除此之外，金價對臺灣進出口貨價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18); 鄭友揆，〈我國海關貿易統計編製方法及其內容之沿革攷〉，《社會科學雜誌》第 5 卷第 3 期（1934，北平），頁 295-296。關於「條約港制度」的影響，見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chap. 1 & 2; Rhoads Murphey,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Albert Feuerwerker, *The Foreign Establishment in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6); Liang-lin Hsiao, *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1864-194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1974).

11 陳計堯，〈「條約港制度」下南臺灣與廈門的商品貿易與白銀流動（1863 到 1895 年）〉，《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第 7 期（2014 年 5 月，臺南），頁 5-36。

12 在過去的研究中，不乏以「通商口岸」稱呼「條約港」，但本文強調「條約」本身所建構的經濟制度與影響，而非清國方面的「開港通商」，故採用「條約港」稱呼英文 “Treaty Port Syste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影響，也因為缺乏海關貨價以外更深入的物價數據而暫時無法回答。[13] 本文所要檢視的是，透過分析開港時代臺灣白銀流動，重新審視我們對於該時代貿易表現的理解與解讀。

本文利用臺灣海關的定期出版品，重建、彙整與分析白銀貿易的統計數據。其中，臺灣海關因為 1895 年主權轉移，有兩個前後銜接的海關機構——清帝國海關（之後的中華民國海關）與臺灣總督府下的「稅關」，這兩個機構亦有兩套不同的定期出版品。本文所檢視的主要是前者——清帝國海關，其出版品主要包含每年「貿易統計」（Trade Returns）與「貿易報告」（Trade Reports），在二戰之後即被學界使用，並成為清帝國與民國貿易史、臺灣經濟貿易史的重要依據。上述資料從 1960 年代末、1970 年代初以來，有多種的微卷、紙本復刻、再版或選編的版本出現，大大幫助相關研究的發展。[14]當然，這些數據背後可能隱藏許多問題，需要更多不同的視角加以分析，本文因篇幅所限，無法一一解讀，就留待日後的研究加以探討。[15]

---

13 關於晚清臺灣出口商品的貨價波動，過去研究較全面考慮市場供需因素，而銀價下跌只是供需以外另一個因素。見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頁 37-43。

14 關於微卷資料，詳見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Publications, 1860-1948*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1970); 再版資料，詳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海關總署辦公廳、中國舊海關史料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舊海關史料（1859-1948）》（北京：京華出版社，2001）；關於臺灣再版的部分，見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等編，《清末台灣海關歷年資料（*Maritime Customs Annual Returns and Reports of Taiwan, 1867-1895*）》（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除開林滿紅，其他學者如戴寶村，顯然只參考了臺灣再版的史料，見戴寶村，《近代臺灣海運發展》，頁 91-102。本文所用之圖表，採自前述頭兩類史料中相關年份的年度統計與報告。全文中所引用、整理的統計數據全來自比對及彙整以上的資料，所以各圖表資料來源不會詳列再版頁碼、報告年份等資料，只顯示海關年統計與年報告的原頁碼與年份，特此請讀者注意。

15 微卷與再版史料皆不完整，而關於這些不同版本之間的問題，以及隱藏的解讀問題，需要更進一步詳細與完整的分析，只好留待另文交代。部分可見 Kai Yiu Cha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Periodical Publications of the Maritime Customs in Southern Taiwan,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本文的研究斷限從 1865 年至 1895 年，其理由有必要在此稍作解釋。在 1860 年的「北京條約」，以及往後的「開港」談判，讓臺灣島有 4 個港口（南北各 2 個）開放對外通商。[16]但各關正式營運起始時間不一，如南臺灣海關（「臺灣府」與打狗，後改為「臺南關」）開始計算貿易統計，是從 1863 年 10 月到 1864 年底，單獨統計打狗而不含「臺灣府」，且只有「貿易統計」而無提供文字敘述、解釋的「貿易報告」。[17]直到 1865 年 1 月，南臺灣 2 個條約港（臺灣府與打狗）的正式「貿易統計」才開始對外發布，並與北臺灣的相關數據一同收入每年的「貿易統計」中，臺灣的 4 大條約港才算全數全面營運。為免在分析架構上出現問題，本文研究的起點是 1865 年全臺 4 大條約港正式對外通商，下限設定在 1895 年日清戰爭（甲午戰爭）與臺灣主權移交。

一、南、北臺灣對比原論

首先，我們必須理解過去對臺灣「開港」時代的貿易表現會產生「南、北」臺灣對比的問題，部分是因為南、北兩地 4 關開放對外國貿易所產生的經濟數據，成為建構歷史敘述的基礎。誠如過去的研究所示，南臺灣的出口品主要是糖品（紅糖為主），除了清帝國北部外，日本也是重要市場，其後也有經過香港銷往歐美國家。[18]進口方面，則以鴉片處於壓倒性的地位。[19]北臺灣（淡水與基隆港）的正式開港與南臺灣同期，商品貿易表現卻不同，在數值上遙遙領先，也成為過去研究者

1863-95," *Asian Research Trends New Series* 13 (2018), pp. 51-70.

16 臺灣開港通商，詳見葉振輝，《清季臺灣開埠之研究》（臺北：標準書局，1985），頁 63-118。

17 Cha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Periodical Publications of the Maritime Customs in Southern Taiwan, 1863-95," pp. 55-56.

18 關於南臺灣的糖品出口，見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頁 23-33。

19 李祖基編，《近代臺灣地方對外貿易》，頁 4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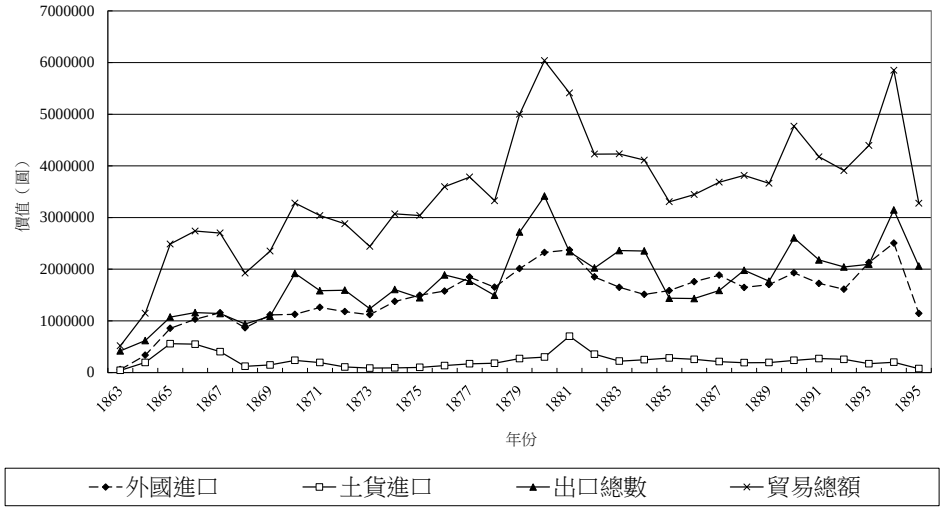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推論臺灣「歷史重心之北移」的重要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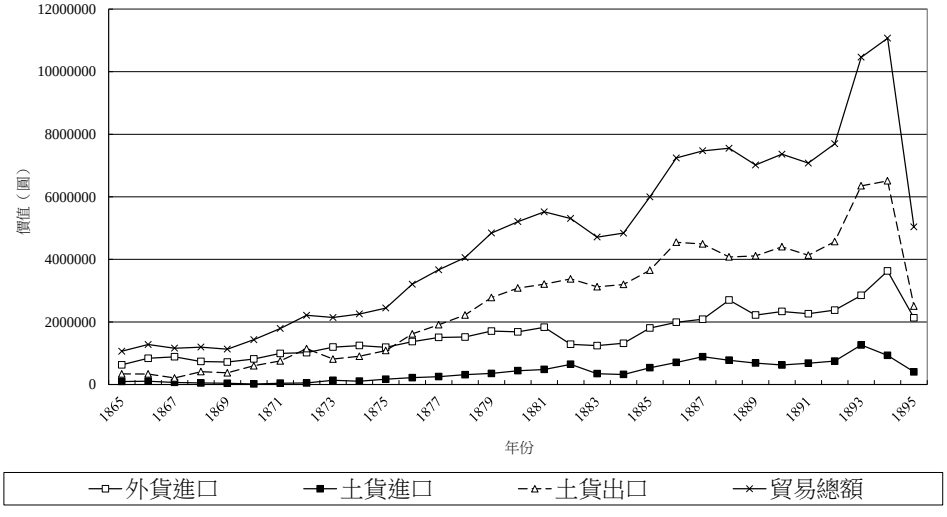
從商品貿易的數據來說，我們可能找到不少的證據支持「北移」的說法。若深入探討海關資料中的「貿易統計」，南臺灣的商品貿易總體表現可從圖一 A 中窺見一二。從該圖可知，南臺灣的商品貿易無論是出口還是進口，在「開港」的 30 年裡還是有增加的，只有「土貨進口」一項一直保持相當低的水平。這部分原因可能與海關當局甚少統計「中式帆船」貿易有關。儘管如此，恐怕也不會改變商品貿易總金額不斷上升的總趨勢。值得注意的是，南臺灣的商品進出口貿易在 1870 年代末、1880 年代初開始出現停滯，雖然偶爾會往上爬升，但亦會回跌。在「開港」時代後期，大概總貿易額波動的幅度在 300-600 萬圓之間。

我們把北臺灣的商品進出口金額與總額編製成圖一 B，從中可見北臺灣各項貿易的發展。與臺南灣相似的是，北臺灣的狀況基本上也是不斷成長，從成長的折線可知幅度比南臺灣為大。唯一相似的是土貨進口，但土貨出口與洋貨進口也是大幅成長。而且，除了在 1895 年出現極大震盪外，其他年份只有少數處於下跌狀態，不久之後又會上升至更高的水平；雖然與南臺灣一樣在 1880 年代後半略為停滯，到了 1890 年代卻又再次回升。畢竟北臺灣有兩項重要出口品（茶、樟腦），比起以糖品出口為主的南臺灣當然會更有活力。若再仔細觀察，北臺灣的總貿易額並非如南臺灣般在一定範圍內波動，而是不斷攀升，從低於 200 萬圓爬升至最高超過 1,000 萬圓，在 1885 年以後，每年都在 600 萬圓以上。從表面的貿易額數據來看，相較於只有兩年達到最高約 600 萬圓水平的南臺灣，北臺灣明顯是優勝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一 A 「臺灣府」與打狗港（臺南關）商品貿易（1863-1895）



圖一 B 淡水與基隆港商品貿易（1865-1895）

單　位：銀圓（Dollar）

備　註：南臺灣原資料在 1875 年以後貨幣單位標示為「海關兩」（Haikwan Tael），現全以 0.75 折算為圓。北臺灣原資料在 1870 年以後貨幣單位標示為「海關兩」，現全以 0.75 折算為圓。全部數據已扣除轉口，屬於「淨進口」，另也並無加入貴金屬金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

南臺灣資料來源：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Takou – Formosa, Under Provisional Regulations from 26th October, 1863, to 5th May, 1864 and From 5th May, to 31st December, 1864* (Shanghai: A. H. de Carvalho Printer & Stationer, 1864);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s of Takow & Taiwan-foo, - Formosa, for the Year 1865* (Shanghai: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Press, 1866);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s of Takow & Taiwan-foo, - Formosa, for the Year 1866* (Shanghai: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Press, 1867); "Takow and Taiwan-foo, - Formosa,"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for the Year 1867* (Shanghai: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Press, 1868); "Takow and Taiwan-foo, - Formosa,"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1868-1872* (Shanghai: The Customs' Press, 1869-1873); "Takow, - Formosa,"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1873-1876* (Shanghai: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tatistical Department, 1874-1877); "Takow, - Formosa,"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1877-1881*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1878-1882); "Takow Trade Returns,"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and Trade Reports, 1882-1890*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1883-1891); "Tainan Trade Returns,"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and Trade Reports, 1891-1895*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1892-1896). 以下簡稱：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Takow and Taiwan-foo [Tainan]*, 1864-1896.

北臺灣資料來源：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Tamsui – Formosa, for the Year 1865* (Shanghai: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Press, 1866);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s of Tamsui & Keelung, - Formosa, for the Year 1866* (Shanghai: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Press, 1867); "Tamsui and Keelung, - Formosa,"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for the Year 1867* (Shanghai: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Press, 1868); "Tamsui and Keelung, - Formosa,"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1868-1870* (Shanghai: The Customs' Press, 1869-1873); "Tamsui, - Formosa,"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1871-1876* (Shanghai: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tatistical Department, 1874-1877); "Tamsui,"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1877*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1878); "Tamsui, - Formosa,"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1878-1881* (Shanghai: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tatistical Department, 1879-1882); "Tamsui Trade Returns,"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and Trade Reports, 1882-1895*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1883-1896). 以下簡稱：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Tamsui and Keelung*, 1866-18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若進一步分析商品貿易表現中的貿易收支，南、北臺灣兩地四港的差異也就更加強北部優勝於南部的論述。在這種貿易總額高度成長的過程中，北臺灣的商品貿易盈餘遠勝南臺灣，關鍵在於出口貿易，這方面我們可以從表一商品貿易收支總盈虧觀察到。從表一可知，南臺灣在開港約 30 年裡，累計總出口金額為 5,747 萬圓，累計進口金額卻也達到 5,648 萬圓，30 年的累計貿易盈餘只有 98 萬圓。反觀北臺灣累計總出口金額高達 8,098 萬圓，累計進口金額卻只有 6,260 萬圓，30 年累計的貿易盈餘達到 1,838 萬圓。

北臺灣雖然在進口方面累計金額比南臺灣高，但也只有 611 多萬圓之差，是項差額大約是南臺灣累計進口金額 10%左右；北臺灣的累計出口金額超過南臺灣 2,338 萬圓之譜，是項差額則為南臺灣累計出口金額的 40%。這種貿易收支的型態並不是從一開始便是如此，而是 1876 年之後才較為明顯（1895 年除外）。這很可能與 1874 年以後的「開山」政策有關，因其使得北部山區與中部盆地進一步開放「漢民」砍伐、移墾、殖民，當時重要的「山產」就是樟腦與茶葉。[20]而往清國市場出口者，也多轉往外國販售。[21]對一般人來說，北臺灣的貿易表現看來著實是比南臺灣為優勝。

然而，上述以南、北臺灣貿易額為中心的對比，卻過度強調「重心北移」的觀察，忽略「開港」時代的貿易數據中其他面向。例如，若以南北兩地的每年貿易總額成長率計算，雖然有差異，總體來說卻呈現波動方向一致。我們把南、北臺灣每年度的商品貿易總額（即包含進口、出口總值），與同地前一年度的商品貿易總值相比，得出該年度的貿易總額年成長率，再以相同方式計算清帝國開港期間南、北兩地四港的商品貿易總額年度成長率趨勢，並繪製成圖二。

20 關於茶與樟腦的開發，見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頁 57-60、63-67、148-153、167-174。

21 北臺灣的茶葉、樟腦出口，就是多由廈門歐美商社所經營的，見東嘉生，《臺灣經濟史研究》，頁 323-331；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頁 1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一　南、北臺灣海關商品貿易收支狀況（1865-18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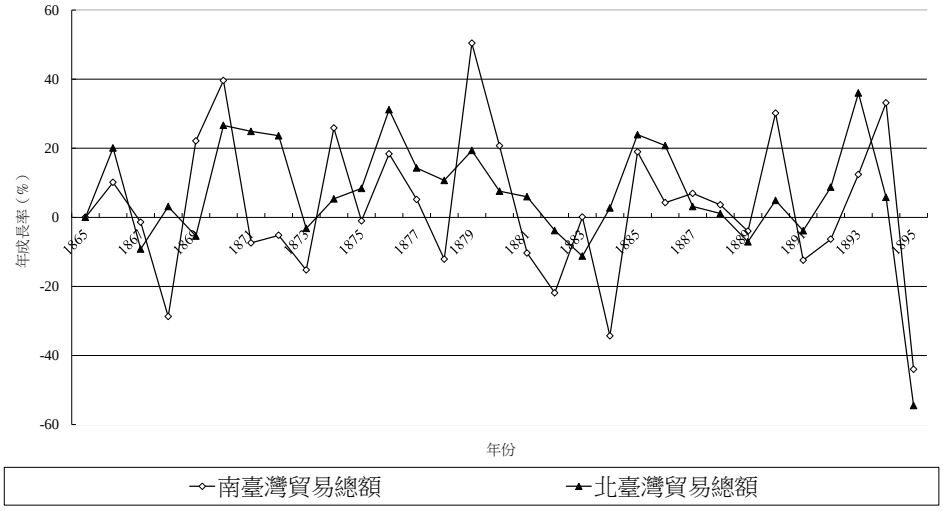
	南臺灣			北臺灣		
年度	總進口	總出口	盈虧	總進口	總出口	盈虧
1865	1,413,515	1,073,252	-340,263	725,410	338,489	-386,921
1866	1,579,864	1,158,778	-421,086	940,462	337,084	-603,378
1867	1,558,841	1,141,082	-417,759	951,487	208,910	-742,577
1868	985,037	938,832	-46,205	784,630	411,778	-372,852
1869	1,261,853	1,087,591	-174,262	758,597	372,990	-385,607
1870	1,361,084	1,918,892	557,808	834,284	598,695	-235,589
1871	1,453,877	1,583,404	129,527	1,035,326	754,478	-280,848
1872	1,285,952	1,593,088	307,136	1,066,137	1,146,557	80,420
1873	1,203,005	1,236,859	33,854	1,327,811	813,739	-514072
1874	1,465,164	1,605,808	140,644	1,351,855	905,167	-446,688
1875	1,594,253	1,445,040	-149,213	1,358,616	1,086,866	-271,750
1876	1,710,102	1,887,659	177,557	1,589,781	1,617,793	28,012
1877	2,016,325	1,767,293	-249,032	1,756,238	1,909,383	153,145
1878	1,830,213	1,494,297	-335,916	1,833,409	2,223,803	390,394
1879	2,282,012	2,719,221	437,209	2,061,751	2,780,449	718,698
1880	2,621,955	3,414,771	792,816	2,125,013	3,084,586	959,573
1881	3,074,127	2,338,288	-735,839	2,310,839	3,211,312	900,473
1882	2,205,235	2,022,321	-182,914	1,931,522	3,386,938	1,455,416
1883	1,870,530	2,360,132	489,602	1,587,986	3,125,902	1,537,916
1884	1,759,215	2,352,876	593,661	1,639,219	3,202,501	1,563,282
1885	1,866,956	1,437,952	-429,004	2,343,355	3,655,217	1,311,862
1886	2,012,833	1,432,000	-580,833	2,696,016	4,553,561	1,857,545
1887	2,095,328	1,588,056	-507,272	2,977,082	4,496,898	1,519,816
1888	1,837,251	1,978,776	141,525	3,475,237	4,079,063	603,826
1889	1,894,755	1,767,197	-127,558	2,905,051	4,114,884	1,209,833
1890	2,163,217	2,604,413	441,196	2,960,172	4,415,845	1,455,673
1891	1,995,998	2,179,016	183,018	2,943,674	4,140,563	1,196,889
1892	1,866,693	2,043,055	176,362	3,125,945	4,573,610	1,447,665
1893	2,298,690	2,095,801	-202,889	4,112,601	6,370,542	2,257,941
1894	2,703,964	3,147,432	443,468	4,560,842	6,552,544	1,991,702
1895	1,218,145	2,059,020	840,875	2,532,971	2,514,078	-18,893
累計	56,485,989	57,472,202	986,213	62,603,319	80,984,225	18,380,906

單　　位：銀圓

備　　註：南臺灣原資料在 1875 年以後貨幣單位標示為「海關兩」，現全以 0.75 折算為圓，再以黃金－白銀比較估算，折算後除去小數點後數字。全部數據已扣除轉口，屬於「淨進口」，另也並無加入貴金屬金額。北臺灣原資料在 1870 年以後貨幣單位標示為「海關兩」，現全以 0.75 折算為圓，折算後除去小數點後數字。全部數據已扣除轉口，屬於「淨進口」，另也並無加入貴金屬金額。

資料來源：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Takow and Taiwan-foo [Tainan]*, 1865-1896;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Tamsui and Keelung*, 1865-18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二　南、北臺灣對外貿易總額年度成長率（1865-1895）

資料來源：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Takow and Taiwan-foo [Tainan]*, 1866-1896;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Tamsui and Keelung*, 1866-1896.

據圖二所示，南、北臺灣在「開港」的 30 年裡，雖然南臺灣只有 13 年的成長率比北臺灣高，北臺灣則有 17 年勝過南臺灣，但在大部分的年度裡，兩地的每年貿易成長率波動趨勢均甚為一致。亦即南臺灣的貿易成長之時，北臺灣亦在成長，兩地也大致一起面對景氣下滑，只有 1868-1869、1872、1875、1883-1884 以及 1887 等 7 個年份例外。例外的原因，可能各有不同，需要更深入的個案分析，始能得知究竟。[22]但可

22 例如，根據 1868 年南、北臺灣兩地的海關洋員報告指出，南臺灣當年的貿易萎縮是因為開徵「釐金」，影響到鴉片的進口（間接也會影響到商品的出口）；而北臺灣當年則是因為樟腦與煤炭出口旺盛，也抵銷部分「釐金」造成的影響。J. Alex Man, "Takow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68,"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for the Year 1868* (Shanghai: The Customs' Press, 1869), pp. 75-81, particularly p. 75; E. C. Taintor, "Tamsui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68; together with Addendum for the Year 1869,"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for the Year 1869* (Shanghai: The Customs' Press, 1870), pp.

臺灣人文與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說，就成長率來說，南、北兩地的相似點比相異點為多。

當然，南、北貿易額的對比是絕對的，就如同在圖二中看到南臺灣在「開港」時代，多次出現負成長的情形，更比北臺灣出現同類事情的程度來得嚴重。與此同時，每年的貿易成長率變化明顯地代表在南、北臺灣貿易成長的背後，存在著一些宏觀的因素，同樣影響臺灣的南北兩端。所以，過去有關南、北臺灣貿易表現的比較，雖然有其重要性，卻也必須探討商品貿易成長以外的因素，而在 19 世紀後半不可忽略的就是白銀以及同時期的金價波動問題。

二、金價波動與臺灣白銀

19 世紀後半的金、銀價波動，在世界經濟史而言，甚為重要。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黃金產量增加，致使更多歐洲國家願意從原本的金銀雙本位轉為金本位；另一方面，世界白銀產量同時增加，影響各國對白銀價值的評估。加上 1871 年誕生的德意志帝國也採用金本位，使得英國以外的其他西歐各國在 1870 年至 1890 年擺盪在金、銀本位之間，對白銀作為貨幣之一，採取時而維持、時而放棄的態度，最終在 1890 年代初完成金本位制度的建置。[23]

157-170, particularly pp. 157-158.

23 英國是在 19 世紀上半就透過多次的立法程序，在 1821 年完全建立所謂「金本位」，見 Lawrence H. Officer, *Between the Dollar-Sterling Gold Points: Exchange Rates, Parity, and Market Behavi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7-42; W. H. Chaloner, "Currency Problems of the British Empire, 1814-1914," in W. H. Chaloner,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Selected Essays* (London: Frank Cass, 1990), pp. 271-300, 特別是 p. 272; Edwin Cannan, intro., *The Paper Pound of 1797-1821: A Reprint of The Bullion Report* (London: P. S. King & son, Ltd., 1925), p. xxxiv. 關於白銀在 19 世紀 70 年代開始的跌價與各國採用金本位問題，見 James Foreman-Peck, *A History of the World Econom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since 1850*, 2nd ed.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5), pp. 154-174; 濱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頁 49-76。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在這段期間，黃金與白銀之間的比價不斷地變化。1870 年以前，歐洲市場上的金銀比價長期維持在 1：15 的比例（即 1 個單位的黃金換 15 單位的白銀），但從 1870 年代開始，這個「均衡」（equilibrium）被打破。我們可自 1930 年代學者楊端六（1885-1966）、侯厚培（1899-?）等人編輯的清帝國及民國海關統計分析國際金價的走勢。根據這些統計資料，最早可以追溯到 1868 年以來的倫敦金價，因為倫敦金價對當時的國際金價具有影響力，在其他地區（尤其是 19 世紀後半的上海、廈門等地）的資料暫時無法取得的情況下，不失作為一個國際金價波動趨勢的重要參考。利用這些國際白銀對黃金的比價資料，編製成圖三。



圖三　1868 年至 1895 年倫敦市場黃金、白銀比價

單　　位：黃金單位（以銀價計算之黃金價值）

資料來源：C. Yang, H. B. Hau, et. al., comp., *Statistics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during the Last Sixty-five Years* (Shanghai: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1931), p.151;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Foreign Trade of China, 1931*, Part 1: *Report 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32), "Note," unpaginated.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圖三可見每一單位的黃金可換取白銀的單位，也就是以白銀計算的黃金價格，從 1870 年代後半開始基本上逐漸上揚。雖然也有下跌，但早已脫離 1：15 的比例，到 1880 年已經達到 1：18.05 的水平，上揚達 20%，且沒有停頓的跡象。1890 年以後，黃金價格上揚趨勢更形急速，從 1890 年的 1：19.25，躍升至 1895 年的 1：31.6，期間雖然在 1890 年有下跌，但回升的力道更強，五年內漲幅超過 50%。若從 1870 年計算，金價的漲幅更達 200%。換言之，這 20 年間白銀資產的持有者資產值等於被折半，而且基本上是逐年遞減。不斷上揚的黃金價格，也等於以白銀為標價的商品顯得更為便宜，相對地促進白銀計價商品往以黃金計價的地區出口。[24]

針對黃金價格上揚對南、北臺灣的意義，林滿紅曾經分析臺灣出口商品的平均價格變動，認為臺灣的茶、糖、樟腦三大國際出口產品之出口價，[25]除受到國際市場與島內供需狀況影響外，亦受到金價波動影響。至於受金價波動的影響程度，林滿紅的研究則未有具體呈現。[26]在沒有更進一步有關進出口各項價格資料的情況下，我們亦難以深層地對於臺灣條約港所受金價波動的影響作更深入的分析，但卻可從宏觀的視野來觀察金價波動的影響。

---

24 C. F. Remer, “International Trade between Gold and Silver Countries: China, 1885-1913,” pp. 597-643; David Faure, *The Rural Economy of Pre-liberation China: Trade Increase and Peasant Livelihood in Jiangsu and Guangdong, 1870-1937*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64-73.

25 其實，19 世紀中葉臺灣尚維持米穀輸出，但以清帝國為市場，直到開港以後。在海關所記的統計資料中，米穀已非國際出口貿易之主力。關於開港前的情況，見林文凱，〈再論清代臺灣開港以前米穀輸出問題〉，收入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頁 99-133；關於開港時代米貿易情況，見謝美娥，《清代臺灣米價研究》（板橋：稻鄉出版社，2008），頁 400-405。林文凱與謝美娥兩人對於開港前狀況的意見分歧，但因為林文凱論文對於開港時代並未深入探討，故此問題只好留待日後研究釐清。

26 對於銀價下跌所造成臺灣出口商品跌價的影響，可見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頁 37-43。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第一個視野是臺灣以白銀作基準的商品價格，在金本位的國家所呈現的價格，全然會受到影響。將前述以白銀計價的商品貿易額，以黃金－白銀比價換算為黃金，整理為表二。表二依照目前能追溯到的黃金－白銀比價，以 1868 年為起點。若單以起迄年份的兩個時間點相比，金、銀計價亦產生不同的數值。以白銀計算南臺灣商品貿易，以 1868 年與 1895 年兩年相比，進口成長率是 123%，出口成長率達 219%；若以黃金折算，進口成長率只有 61%，出口成長率只有 108%。北臺灣的情況一樣，若以 1868 年與 1895 年兩年相比，商品貿易的進口成長率是 322%，出口成長率是 610%；若以金價計算，北臺灣的進口成長率只剩 159%，出口成長率是 301%。換言之，如同前述以金、銀比價來說明的一樣，單以南、北臺灣面臨相同的金、銀比價關係，對於以金本位為計價單位進口的商業經營者來說，因為黃金價格上揚的關係，影響到進口貨價的上升；而對於同意以金本位為計價單位出口的商業經營者來說，其出口貨價會相對逐漸減輕，獲利也就逐漸增加。

但若進一步分析金價波動與南、北臺灣的關係，不難發現南北兩地存在相當的差異。根據表二的資訊編製圖四 A、圖四 B，展示南、北臺灣在面對金價波動時，總貿易額的變化趨勢。圖中表示的金價貨值折線與銀價貨值折線，是分別以各自的數值軸為基礎，所以兩者之間的實際差距是金、銀的比價。但從這兩圖可見，在金銀比價波動之下，南北兩地的貿易表現其實存在明顯的差異。

簡單來說，北部的金、銀計價的貿易總額從 1870 年以後逐漸拉開距離，這個距離大致上就是金銀比價的關係，直到 1890 年以後，這個比價又突然改變，也反映金銀比價的再次波動對北臺灣的影響。至於南部金、銀計價的貿易，總額從 1868 年開始到 1870 年代中期，也一直出現分歧波動的金銀貨價。從 1870 年代中期到 1880 年代中期，南部金、銀計價的貿易卻維持在一個穩定的距離，視覺上近乎重疊，但 1880 年代中期以後，在金銀比價影響下，兩組數據距離又逐漸拉開，且比北臺灣更早拉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二　南、北臺灣海關商品金、銀計價貿易額（1868-1895）

年度	南臺灣				北臺灣				金銀比（每一金單位對銀單位）
	南臺灣總進口（銀）	南臺灣總出口（銀）	南臺灣總進口（金）	南臺灣總出口（金）	北臺灣總進口（銀）	北臺灣總出口（銀）	北臺灣總進口（金）	北臺灣總出口（金）	
1868	985,037	938,832	63,183	60,220	784,630	411,778	50,329	26,412	15.59
1869	1,261,853	1,087,591	80,888	69,717	758,597	372,990	48,628	23,909	15.60
1870	1,361,084	1,918,892	87,417	123,242	834,284	598,695	53,582	38,451	15.57
1871	1,453,877	1,583,404	93,376	101,695	1,035,326	754,478	66,494	48,457	15.57
1872	1,285,952	1,593,088	82,274	101,925	1,066,137	1,146,557	68,210	73,352	15.63
1873	1,203,005	1,236,859	75,518	77,643	1,327,811	813,739	83,352	51,059	15.93
1874	1,465,164	1,605,808	90,666	99,369	1,351,855	905,167	83,654	55,934	16.16
1875	1,594,253	1,445,040	95,808	86,841	1,358,616	1,086,866	81,647	65,277	16.64
1876	1,710,102	1,887,659	96,343	106,347	1,589,781	1,617,793	89,565	91,112	17.75
1877	2,016,325	1,767,293	117,228	102,749	1,756,238	1,909,383	102,106	110999	17.20
1878	1,830,213	1,494,297	102,132	83,387	1,833,409	2,223,803	102,310	124,072	17.92
1879	2,282,012	2,719,221	124,089	147,864	2,061,751	2,780,449	112,112	151,182	18.39
1880	2,621,955	3,414,771	145,260	189,184	2,125,013	3,084,586	117,729	170,836	18.05
1881	3,074,127	2,338,288	168,445	128,125	2,310,839	3,211,312	126,621	175,827	18.25
1882	2,205,235	2,022,321	121,166	111,116	1,931,522	3,386,938	106,127	185,551	18.20
1883	1,870,530	2,360,132	100,350	126,616	1,587,986	3,125,902	85,192	167,607	18.64
1884	1,759,215	2,352,876	94,530	126,430	1,639,219	3,202,501	88,082	171,954	18.61
1885	1,866,956	1,437,952	96,185	74,083	2,343,355	3,655,217	120,729	188,261	19.41
1886	2,012,833	1,432,000	96,863	68,912	2,696,016	4,553,561	129,740	218,870	20.78
1887	2,095,328	1,588,056	99,304	75,263	2,977,082	4,496,898	141,093	212,991	21.10
1888	1,837,251	1,978,776	83,511	89,944	3,475,237	4,079,063	157,965	185,367	22.00
1889	1,894,755	1,767,197	85,735	79,963	2,905,051	4,114,884	131,450	186,117	22.10
1890	2,163,217	2,604,413	112,374	135,294	2,960,172	4,415,845	153,775	228,692	19.25
1891	1,995,998	2,179,016	95,410	104,159	2,943,674	4,140,563	140,711	197,615	20.92
1892	1,866,693	2,043,055	78,697	86,132	3,125,945	4,573,610	131,785	192,618	23.72
1893	2,298,690	2,095,801	86,775	79,116	4,112,601	6,370,542	155,251	239,765	26.49
1894	2,703,964	3,147,432	83,045	96,665	4,560,842	6,552,544	140,075	199,968	32.56
1895	1,218,145	2,059,020	38,548	65,158	2,532,971	2,514,078	80,157	79,284	31.60

單　　位：「銀」者為「銀圓」；「金」者為黃金單位折算。

備　　註：原資料在 1875 年以後貨幣單位標示為「海關兩」，現全以 0.75 折算為圓，再以黃金－白銀比較估算，折算後除去小數點後數字。全部數據已扣除轉口，屬於「淨進口」，另也並無加入貴金屬金額。

資料來源：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Takow and Taiwan-foo [Tainan]*, 1869-1896;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Tamsui and Keelung*, 1869-1896.

金-銀比價：C. Yang, H. B. Hau, et. al., comp., *Statistics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during the Last Sixty-five Years*, p.151;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Foreign Trade of China, 1931*, Part 1: *Report 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 "Note", unpaginated.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實際上，「開港」時代臺灣三大國際出口品（茶、糖、樟腦），與黃金計價的關係並不一致，白銀價格下跌所造成的影響也就不同。就南臺灣的糖品出口來說，在「開港」初期絕大部分運往清國港口，在 1870 年開始清國市場比例下降至 20-40%，直至 1884 年以後基本上升至 40% 以上；外國方面，日本佔全部外國出口中近 70%，但在 1885 年以後幾乎全超過 90%。[27]清、日兩國當時卻是以白銀計價的市場，受到金價上揚的影響有限。而圖四 B 中，金、銀計價幾乎重疊的 1870 年代中期到 1880 年代中期，正好就是南臺灣糖品推往世界市場最遠的時期，最遠甚至達到金本位的發祥地英國，以及仍為英國殖民地的澳洲。[28]

與此相反，茶葉與樟腦出口雖然全指向廈門、香港這兩個使用白銀的地區，但絕大部分仍轉往英、美、歐洲大陸出口。[29]所以，在「開港」時代後半銀價大幅下跌之時，茶與樟腦的出口可能也受到更大的影響。雖然目前無具體史料證明匯率波動對臺灣的茶、樟腦出口貿易有直接影響，但確實對進口商帶來短期衝擊。根據淡水海關洋員 1890 年的報告：「匯率意外的上升，或許說已經對東方各地整個商業年度造成影響，會自然地導致進口商試圖把他們的庫存清空，這已使得貨物價格比 1889 年約低出 20%左右。」[30]在此情況下，出口商因應匯率對出口商品帶來影響的同時，可能連帶影響進口業務的狀況。簡言之，南、北臺灣的產業結構、銀價波動與折算等問題，對於兩地以白銀計價的貿易表現來說，存在相當的潛在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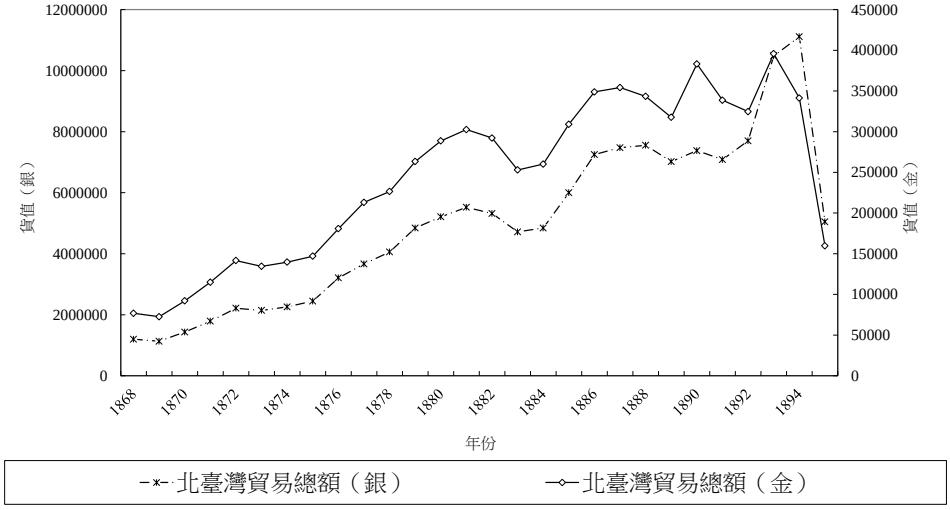
27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頁 25、30-31。

28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頁 30-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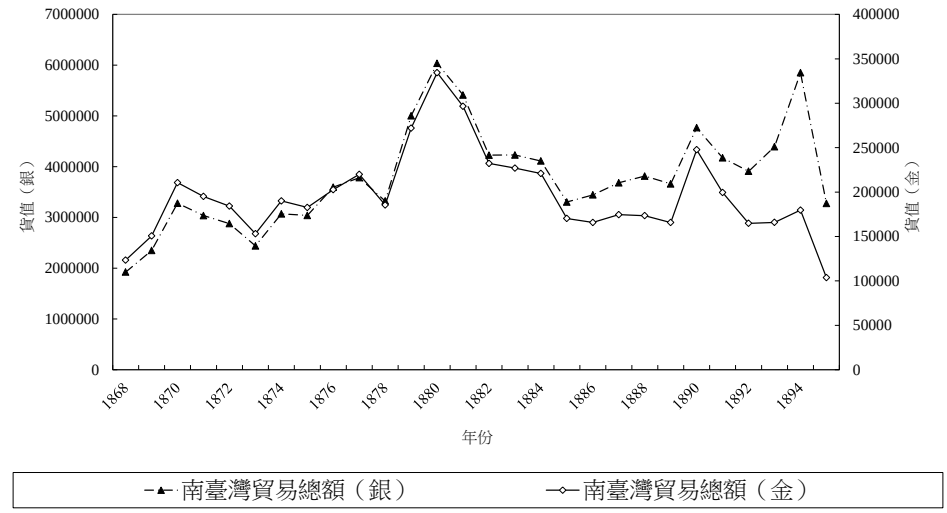
29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頁 19-23、33-38。

30 F. Hirth, “Tamsui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90,”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of the Treaty Ports and Trade Reports for the Year 1890*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91), pp. 318-321, particularly p. 318. 中譯為作者自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四 A 北臺灣金、銀計價貿易額（1868-1895）



圖四 B 南臺灣金、銀計價貿易額（1868-1895）

單　位：「銀」者為「銀圓」；「金」者為黃金單位折算

備　註：原資料在 1875 年以後貨幣單位標示為「海關兩」，現全以 0.75 折算為圓，再以黃金－白銀比較估算。全部數據已扣除轉口，屬於「淨進口」，另也並無加入貴金屬金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資料來源：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Takow and Taiwan-foo [Tainan]*, 1869-1896;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Tamsui and Keelung*, 1869-1896.

金-銀比價：C. Yang, H. B. Hau, et. al., comp., *Statistics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during the Last Sixty-five Years*, p.151;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Foreign Trade of China, 1931*, Part 1: *Report 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 "Note," unpaginated.

第二個視野是商業資訊，因為金銀價格的波動除了普遍影響歐美商人採購臺灣商品的風險之外，亦會影響歐美外事人員對臺灣經濟狀況的報導。外國駐臺外事人員平時需要撰寫報告，向本國彙報派駐地的政經狀況，所依賴的一個重要資訊來源就是清帝國海關的出版品。最重要的例子是：大不列顛（英國）的駐臺外交人員因每年必須向倫敦報告有關臺灣的情況，所以會直接向清帝國海關取得相關的貿易資料，並使用在其報告內容中。[31]事實上，若仔細比較英國的「領事報告」與清帝國海關的報告，讀者不難發現兩者的內容相似，只是英國的「領事報告」將大部分的數值與度量衡轉為英式標準，亦即把以白銀為準的「海關兩」（Haikwan Tael）轉為以黃金為準的「英鎊」，也就直接影響到英國國會及商界對臺灣貿易狀況的理解。

19 世紀後半臺灣的白銀議題有二：除了因為金價而影響貨值與收益，更密切的是有大量的白銀在臺灣流通。不過，這些數量龐大的白銀並非全然只有進入臺灣市場，其流進、流出均有相當深遠的意義。

三、白銀：作為商品與資本

無論是白銀抑或黃金（所謂「貴金屬」），都是人類歷史上重要的貨幣媒介、財富象徵。[32]近世、近代的「重商主義」亦以貴金屬為基礎，

31 相關例子，詳見 Robert L. Jarman, ed.,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London: Archive Editions, 1997), vol. 1, pp. 121, 329, 613, 694-695; vol. 2, pp. 119, 263, 434; vol. 3, pp. 193, 243; vol. 4, p. 620; vol. 5, p. 174.

32 E. Victor Morgan, *A History of Mone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 1965), pp. 9-31;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建構一系列的經濟與貿易政策。[33]簡單而論，貴金屬的流入象徵財富的流入，成為國家富裕的指標，相反則是財富外流、國家貧窮。所以，在仍然倚重貴金屬的 19 世紀，貿易往來的同時，貴金屬格外受到重視。

在臺灣，白銀大量進入地方社會，是從近代臺灣形成起點的南臺灣開始。目前的研究成果顯示，臺灣自從荷蘭東印度公司在 17 世紀利用南部的據點（熱蘭遮城與普羅民遮城）開始，就逐漸廣泛使用歐洲、美洲鑄造的銀幣。清帝國領有臺灣後推行銀兩作為貨幣單位，但臺灣民間（當時主要是府治附近為主的聚落）依舊選擇使用銀幣（常用單位為「圓」），致使清帝國於 1740 年同意以銀幣折銀兩納餉，形成一種以銀幣為主的「白銀貨幣」體系。[34]這種以歐美銀幣為主的貨幣體系，因涉及到銀幣本身白銀的成色、重量等，亦可與清帝國官方的「銀兩」以折算方式兌換作稅金，被後世稱為與清帝國「銀兩」制度一致的「秤量貨幣制」。[35]不過，從 18 世紀中葉開始，在府治（逐漸形成日後的「臺灣

Charles P. Kindleberger, *A Financi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9-36; 大英博物館著，周全譯，《金錢的歷史》（臺北：博雅書屋，2009），頁 11-315。

33 關於「重商主義」的討論，見 Charles Wilson,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Historian: Collected Essay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39), pp. 48-93.

34 關於白銀貨幣制度的建立，可見 Kai Yiu Chan,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in the Pre-Nineteenth-Century 'Prefectural City' of Taiwan," in *Nanying History, Society and Culture* V: *Early Tainan Region* (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V：早期南瀛), ed. Liu Yi-chang (劉益昌) and Ann Heylen (賀安娟) (Tainan 臺南: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of Tainan City Government 臺南市文化局, 2019), pp. 221-285；李冕世、黃典權，〈清代臺灣貨幣制度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歷史學報》第 3 號（1976 年 7 月，臺南），頁 1-54；鄭永昌，〈清代前期臺灣貨幣流通的發展與變遷（1684-1800）〉，《故宮學術季刊》第 19 卷第 1 期（2001 年秋，臺北），頁 227-261。另外，王世慶曾經以物價相關的資料探討 19 世紀中葉臺灣北部不同銀貨的問題，見王世慶，〈十九世紀中葉臺灣北部銀錢比價變動初探〉，收入陳秋坤、洪麗完主編，《契約文書與社會生活（1600-1900）》（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 141-172。

35 關於清帝國的「銀兩」制度，見宮下忠雄，《近代中国銀両制度の研究——中国幣制の特殊研究》（東京：有明書房，1990 重印本）；關於臺灣的「秤量貨幣制」，見北山富久二郎，《臺灣に於ける秤量貨幣制と我が幣制政策》，頁 9-110。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府城」）為首的南臺灣地區，繕寫交易（尤其是土地）契約時，所使用的貨幣單位並非折算後的「銀兩」，而是「圓」（或「元」、「員」）。[36] 因此，南臺灣的「白銀貨幣」體系不單能以「成色」、「重量」為中心的「銀兩」制度來理解，而是一種「圓圓不對等」的「銀圓」貨幣。[37]

1860 年代臺灣「開港」之際，銀圓即成為清帝國海關的貨價計算單位。[38] 1860 年代後半期，海關偶爾會用「兩」（Tael）或「上海兩」（Shanghai Tael）折算，但仍然以「圓」作基本紀錄。北臺灣在 1870 年開始使用「海關兩」的單位，折算率卻與過去的「兩」或「上海兩」一樣（1 圓＝0.75 海關兩），而南臺灣海關到 1875 年也開始用「海關兩」記載所有數據，海關官員也表明「不曾輸入銀錠，且金子來得很少」。在其他記載中，將銀圓兌換成海關兩前，亦會提及原本的貨幣型態與數量。[39]所以，清帝國下的臺灣海關對於白銀流動的紀錄，縱使以「海關兩」折算，但流動的本身仍以銀圓（銀幣）形式進行，亦即白銀貿易基本上是指銀圓貿易。

---

36 Chan,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in the Pre-Nineteenth-Century ‘Prefectural City’ of Taiwan,” pp. 234-245.

37 關於「圓圓不對等」的「銀圓」貨幣問題，參見濱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頁 53-62；Akinobu Kuroda, “Concurrent but Non-integrable Currency Circuits: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s among Monies in Modern China and Other Regions,” *Financial History Review* 15, no. 1 (2008), pp. 17-36.

38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Takou – Formosa, Under Provisional Regulations from 26th October, 1863, to 5th May, 1864 and From 5th May, to 31st December, 1864* (Shanghai: A. H. de Carvalho Printer & Stationer, 1864), p. 14.

39 P. H. S. Montgomery, “Tainan: Decennial Report, 1882-91,”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 Navigation, Industries, Etc., 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in China and Corea, and on the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 1882-91*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93), pp. 463-494, particularly p. 481; W. F. Spinney, “Takow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93,”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and Trade Reports for the year 1893*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94), pp. 373-376, particularly p. 37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問題是從臺灣開港到政權更易，東亞曾經出現過多種的機製銀幣，除了拉丁美洲所產的各種銀幣外，尚有「美國貿易銀」、「日本圓銀」、「香港銀圓」，以及「西貢銀圓」等，[40]但清帝國海關的統計並沒有詳細分類，使我們對於 1895 年以前哪些銀圓實際上在臺灣「條約港」流通，以及它們的「流動」情況，所知有限。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曾經在不同的時間點，調查當時各種貨幣流通的情況，但並非針對相關貨幣在日治以前的「流動」（貿易）情況。[41]令人意外的是，部分線索卻可見於臺灣總督府海關機構（臺灣稅關）每年公布的「貿易統計」。[42]根據「臺灣稅關」的「貿易統計」顯示，從可上溯最早的 1888 年至 1894 年為止，白銀流動只涉及「墨西哥銀」一種。[43]不過，此「墨西哥銀」

40 陳計堯，〈「條約港制度」下南臺灣與廈門的商品貿易與白銀流動（1863 到 1895 年）〉，頁 27。

41 例如，在 1897 年中，鳳山縣知事發文調查管內的貨幣流通情況，見〈貨幣流通景況報告ノ件（元臺南縣）〉（1897 年 7 月 1 日），《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9785 冊，文號 002，http://ds3.th.gov.tw/ds3/app000/（2018 年 9 月 21 日檢索）。其實，以「貨幣」二字檢索《總督府公文類纂》，共出現 658 筆資料，除了貨幣流通調查外，尚有偽幣、外幣流通等問題，顯然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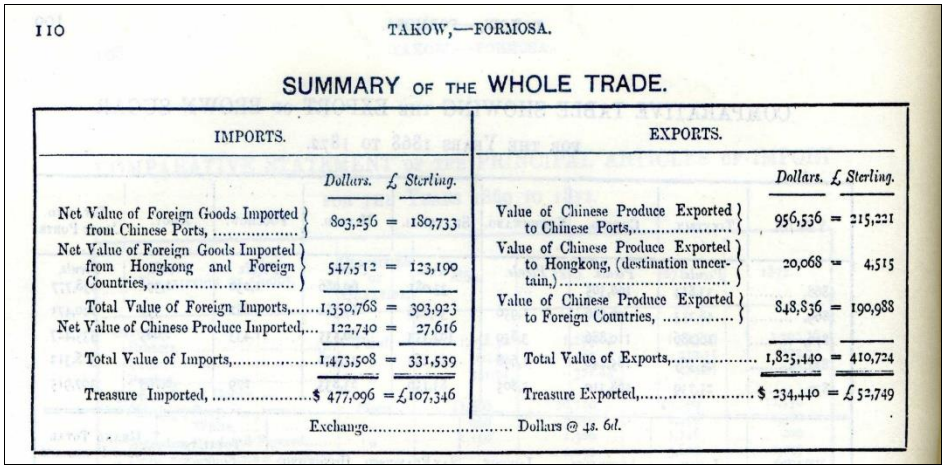
42 可惜的是，臺灣現藏有關日治初期海關每年貿易統計書（非指所謂的「貿易報告」）並不齊全，雖然近年有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電子書可供下載，但仍然不完整。尤其是 1896 至 1901 年的六年資料只有紙本版的統計書，典藏於日本一橋大學，1902 年、1904 年的資料藏於國立臺灣大學，1905 年資料藏於國立臺灣圖書館，顯得相當分散，有待彙整。目前我們只能依靠《臺灣總督府統計書》中與海關每年統計書內容相同的貴金屬貿易統計加以整理。關於日本國會圖書館的電子典藏，見臺灣總督府編纂，《台湾外国貿易年表》（明治 44 年至昭和 14 年），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http://dl.ndl.go.jp/（2016 年 3 月 19 日檢索）；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統計書》（明治 30 年至昭和 19 年），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http://dl.ndl.go.jp/（2016 年 4 月 10 日檢索）。臺灣的圖書館典藏，請參閱吳聰明、葉淑貞、劉鶯釧編，《日本時代臺灣經濟統計文獻目錄》（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1995）。有關各項每年統計書的收藏情況，見林玉茹，〈日據時期臺灣的稅關資料及其運用〉，收入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主編，《國家航海》第 16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頁 82-122，特別是頁 103。

43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編，《臺灣總督府第一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899），頁 174-175；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編，《臺灣總督府第二統計書》（臺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究竟是墨西哥獨立前的「卡洛斯銀圓」（Carolus Dollar，又稱「本洋」），還是獨立後的「墨西哥銀圓」（Mexican Dollar，俗稱「鷹洋」），則並無詳盡的描述，難在詞彙含意上認定所指幣別。至 1895 年開始，才有日本的「圓銀」出現，「香港銀圓」更遲至 1897 年才出現。

更重要的是，從「開港」開始，貴金屬就不列入商品貿易的計算中，也就是進出口貨價本身的價格與貴金屬進出口本身並無直接關係。海關記錄商品貿易內容時，並非把貴金屬與其他商品一併計算，而是另外開列項目——稱為「財富」（Treasure）處理。其計算方式一如商品貿易，有進有出。1873 年以前，南臺灣海關的年度總結算中，商品貿易與貴金屬「貿易」也會分列開來，但貴金屬仍與商品貿易的「出口」、「進口」並列在總「出口」、「進口」類別之下（如圖五）。



110 TAKOW,—FORMOSA.

SUMMARY OF THE WHOLE TRADE.

IMPORTS.	Dollars.	£ Sterling.	EXPORTS.	Dollars.	£ Sterling.
Net Value of Foreign Goods Imported from Chinese Ports,	803,256	= 180,733	Value of Chinese Produce Exported to Chinese Ports,	956,536	= 215,221
Net Value of Foreign Goods Imported from Hongkong and Foreign Countries,	547,512	= 123,190	Value of Chinese Produce Exported to Hongkong, (destination uncertain,)	20,068	= 4,515
Total Value of Foreign Imports,	1,350,768	= 303,923	Value of Chinese Produce Exported to Foreign Countries,	848,836	= 190,988
Net Value of Chinese Produce Imported,	122,740	= 27,616			
Total Value of Imports,	1,473,508	= 331,539	Total Value of Exports,	1,825,440	= 410,724
Treasure Imported,	$ 477,096	= £107,346	Treasure Exported,	$ 234,440	= £52,749

Exchange..... Dollars @ 4s. 6d.

圖五　1872 年南臺灣海關「貿易統計」中的貿易總結算

資料來源：“Takow and Taiwan-foo, - Formosa,”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1872*, p. 110.

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900），頁 288-289；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編，《臺灣總督府第三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901），頁 411-412。

臺灣人文與社會期刊資料庫

不過，因為貴金屬的地位不確定，所以並未結算商品貿易與貴金屬貿易兩類總額。而且，這種算法從 1873 年消失，只剩下商品貿易本身的結算。北臺灣方面更加簡單，從 1865 年以來便不曾一併計算貴金屬與商品貿易。明顯地，各地的海關官員意識到貴金屬的流動，其意義與商品流動有很大的差別。

19 世紀後半的臺灣，金融機構不若當代。因為當代銀行制度盛行，國家管理貿易金融成為常態，對於貿易差額的處理，可以輸出、入貴金屬（或外匯）達成，與 19 世紀後半的臺灣，顯然有一定的差距。例如，曾經作為臺灣「首府」的「臺南府城」，在 1890 年代初期一位海關洋員的描述下，並沒有「錢莊」、「外國銀行」或類似的金融機構。[44]縱使如此，商人仍可透過以廈門為基地的「媽振館」，以匯兌方式把需要的資金匯入臺灣，以完成商品貿易。[45]此外，北部也有「匯單館」的機構，專門處理商業匯款業務。[46]亦即雖然沒有專門經營各種金融業務的機構（所謂「銀行」、「錢莊」），卻有多種分割其業務的商業機構，讓商人可以匯兌。晚清臺灣商人與客戶、合作夥伴之間，經常以對帳（或過帳）、匯票方式匯兌資金，[47]甚至可以透過外國傳教士買賣匯票，達到商業匯兌的功能。[48]諸如此類的匯兌或過帳方式，更證明白銀流動並非

44 Montgomery, “Tainan: Decennial Report, 1882-1891,” p. 488.

45 臺灣總督府財務局金融課，《臺灣の金融》（臺北：臺灣總督府財務局金融課，1930），頁 10-15。

46 關於「匯單館」，見林玉茹，〈開港前後臺灣南北雙核心區域型經濟區的形成與發展（1851-1895）〉，《地域文化研究》2017 年第 3 期（長春），頁 12-51，特別是頁 19-23。「匯單館」還是可以經營放貸業務，與銀行、錢莊無異，但對外國人（如海關洋員）來說，仍然只是一個專營匯兌的機構。

47 參見林玉茹對鹿港商號帳簿、文書的分析，見林玉茹，〈商業網絡與委託貿易制度的形成——十九世紀末鹿港泉郊商人與中國內地的帆船貿易〉，《新史學》第 18 卷第 2 期（2007 年 6 月，臺北），頁 61-102，特別是頁 86-90。這些帳簿、商業文書與信件，亦可參見林玉茹、劉序楓編，《鹿港郊商許志湖家與大陸的貿易文書（一八九五—一八九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6）。

48 最近，蘇約翰（John Schufelt）編輯有關英國長老教會傳教士李庥（Hugh Ritchie）與妻子（Elizabeth Ritchie）在臺灣傳道的書信集。例如，信號第 69（1873 年 12 月 28 日）

臺灣人文與醫療期刊資料庫

全然為了購買商品，因為這些商品的交易早經過匯兌、過帳的方式完成。換言之，部分為購買臺灣商品而需要的白銀，可以透過對帳（過帳）、匯票（或「匯單」）與臺灣本土的貨幣供應，以滿足其需求，無須增加新的銀貨進入。留在海關貿易統計上的商品交易貨價，也就只是被商人報關時登錄所用，成為相關交易的歷史紀錄；商品貿易所產生的數據，其實不需要額外的白銀支付。

另一方面，白銀貿易與商品貿易之間，其實存在相當的差異。商品貿易本身所涉及的是物品之間的交換，除了互通有無之外，也涉及購買貨物時的交易貨幣，這時貴金屬所代表的實體通貨（Hard Currency）就發揮功用。但白銀、黃金等貴金屬當被作為貨幣使用時，本身也會因為貴金屬之間的差價而成為有利可圖的商品。更有甚者，世界各國鑄造各式的銀幣，在東亞流通時，卻同時在成色、重量之外，因為特定銀幣的供需因素而產生價差。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西班牙所屬美洲殖民地在 18 世紀中葉所產的「卡洛斯銀圓」，歷經卡洛斯三世、四世以及費迪南七世三任國王，依然保持在全球銀幣市場上的影響力。到了墨西哥 1821 年獨立，逐漸停產而轉為稀有，但因為價差的關係讓商人卻步，甚至因此造成 19 世紀中期清國貨幣市場上的「銀荒」，致使廣州、上海等地必須下令停止使用「卡洛斯銀圓」為結算單位，改用獨立後墨西哥政府發行的「墨西哥銀圓」。[49]儘管如此，民間與其他沿海省份依舊對「卡洛斯銀圓」存在需求，甚至 1880 年的廈門海關，仍有以增加匯價達一成作

即記載相關事實。參見 Hugh and Elizabeth Ritchie 著，蘇約翰（John Schufelt）主編、導讀，林淑琴譯，《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宣道書信集（*The Mission Correspondence of Hugh and Elizabeth Ritchie*）》（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9），頁 271-272。

49 關於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獨立，見 Leslie Bethell,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vol. 3, *From Independence to c. 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3-296; 關於廢除「卡洛斯銀圓」為結算單位，見 Takeshi Hamashita, "Foreign Trade Finance in China, 1810-50," in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Ming-Q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ed. Linda Grove and Christian Daniels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4), pp. 387-435.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為換算「卡洛斯銀圓」的代價。[50]簡言之，當白銀貨幣成為一種商品而進行貿易的同時，「貨幣供應」本身也隱藏一個複雜的「貨幣市場」，內裡可能包含千百種貨幣互相競爭、替補。[51]

此外，在紙幣大量流行的 20 世紀以前，貴金屬流動的意義在於，它代表一種（或多種）貨幣或商品，同時也代表財富與資本：商人用以投資的資本、賴以周轉的資金，其基礎建立在貴金屬的供需。最直接的資

50 F. E. Woodruff, "Amoy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80,"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for the Year 1880*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1881), pp. 211-237, particularly p. 211. 據說類似的情況也延續到 20 世紀初期的部分地區，見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頁 788。

51 這一方面，19 世紀臺灣的資料並未能很清楚說明多種貨幣之間的相互競爭。但在 1900 年代末、1910 年代初的滿洲，同樣是「圓」的各種貨幣（包括日本圓銀、大清銀圓、「新墨銀」、「舊墨銀」、「香港銀圓」等）之間的比價完全不一，東亞貨幣的問題從此可見一斑。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1910），頁 185-186、198-199、203、206-207、219-220、229-231、241、249-251、256-257、265、268-269、277-278、289-290、304-305、311-312；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續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1911），頁 21-22、40、54、61、79-80、88、103-104、116-117、132-133、147、170；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1909），頁 17、19-20、90-91、93、111-112、137-138、155-156、188-190、214-217；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壹》（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1912），頁 63-66、81-82、99-100、116-117、164-168、177-178、199-200、235、246、256；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二》（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1910），頁 95-98、131-132、137-138、147-148、166、188、194；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三》（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1911），頁 33、56、73-74、94、114、134、157-158、178-179、193；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四》（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1911），頁 45、105-110、135、148、158、174-175；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五》（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1911），頁 10、17-18、26-27、38-40、55-56、67-68、113-118、183-185、195；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六　營口》（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1910），〈第三篇　金融〉，頁 52-62。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本方式就是來臺採購時的「現金」（Cash），這可以在海關《十年報告，1882-91》中得知：「一旦購糖量已經達到時，就沒有對銀圓的需求，而貨幣就會被再送往廈門。」[52]所以，貴金屬的外流象徵財富與資本的外流；相反地，貴金屬的流入代表資本的湧入。當然，貴金屬的流動亦可能是因為投資機會與獲利期待的轉移，就如同 19 世紀後半的英國投資者，向全世界輸出資本以獲取投資所得。[53]如是者，從他方來的投資者也可以白銀投資臺灣，從事各種生產事業，[54]反之亦然。

從上述白銀與商品貿易關係的闡述，我們可以歸納出三種 19 世紀後半臺灣白銀流動的意義：（1）採購商品的貨款；（2）投資股份的股金；（3）作為一種商品，隨價而動。前兩者基本上是國際貿易金融上所謂「資本帳」的部分內涵，最後者則是既有商品性質，又可以影響資本帳。在沒有更細緻資料的情況下，我們只能審視在海關貿易統計中貴金屬的計算，從中檢驗白銀流動的型態，從而重新理解 19 世紀後半葉臺灣的經貿狀況。

---

52 Montgomery, “Tainan: Decennial Report, 1882-91,” pp. 480-481.

53 關於 19 世紀後半至 20 世紀初英國對外投資，研究甚多，較著名者例如：A. R. Hall, *The Export of Capital from Britain 1870-1914*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68); Michael Edelstein, *Overseas Investment in the Age of High Imperialism: the United Kingdom, 1850-1914* (London: Methuen, 1982), pp. 47-72; François Crouzet, *Britain Ascendan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Franco-British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pter 11, pp. 385-413; Sydney Pollard, *Britain's Prime and Britain's Decline: The British Economy 1870-1914*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9), pp. 58-114.

54 例如，清領至日治初期，福建的東石蔡家即以族人合股方式，投資臺灣嘉義東石的魚塭養殖業。又如，在嘉慶二十五年（1820），布袋蔡家以「佛銀貳百肆拾大元」購得魚塭股份（所謂「鹽份」），同年又以「佛面伍拾大員」收購另一座魚塭。參見蔡長劍策劃，蔡長安編著，《東石源利族人徙台貨殖書契》（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頁 86-89。宗族之間也出現股份轉讓、承買、收購的情況，例如道光元年（1821），就有「蔡樹暢」把所繼承的股份轉賣給「房親樹凉」，價格是「銀玖拾大員」，可見股份買賣之頻繁。見蔡長劍策劃，蔡長安編著，《東石源利族人徙台貨殖書契》，頁 90-91。關於清治時期的魚塭經營，尚可參考曾品滄，〈塭與塘：清代臺灣養殖漁業發展的比較分析〉，《臺灣史研究》第 19 卷第 4 期（2012 年 12 月，臺北），頁 1-47。

臺灣大學圖書館授權

四、白銀流動：方向與差異

清帝國的「條約港」隨著國境的變化而更替，白銀貿易數據在組織方法與計算方式上，也隨著海關在不同時代的設計而改變。但白銀貿易與各地主要商品（Staple Goods）的不同之處，在於各地主要商品（如茶、糖、樟腦、絲）在 19 世紀後半多是單向貿易，即某地出口某主要商品，基本上不會進口大宗相同產品，但有不少港口與港口之間卻會出現白銀雙向往來的情況。雖然這些數據資料仍然存在不少缺陷，我們仍可以從中重建該條約港的「金流」狀況。

首先，我們先審視海關統計資料中北臺灣的白銀流動狀況，因為當地的商品貿易金額龐大。在北臺灣海關貿易統計中，「貴金屬」一項在最初的年度並不清楚說明金屬類別。雖然，北臺灣因為有金礦開採，在「開港」時代晚期有少量黃金以「金塊」型態出口，[55]但在整個「開港」時代來說，北臺灣的貴金屬流動主要仍然是白銀，並且是以銀圓而非銀錠的型態出現。我們以這些白銀貿易為主（也就是扣除少量的黃金），編製表三以幫助分析。根據表三所示，北臺灣的白銀對外國方面很單純，只有英國殖民地香港一地。而在眾多的清帝國條約港當中，與南臺灣地緣、歷史關係最深的廈門，跟北臺灣同樣有深厚且重要的白銀往來關係。1881 年至 1888 年的海關「貿易統計」，甚至以「主要為廈門」（chiefly Amoy）來蓋過所有的銀貨貿易夥伴，這應該與歐美貿易商（尤其是茶商）多以廈門為據點，親自或派遣買辦到臺灣採辦茶葉與樟腦有關。[56]另外，比較特殊的是廈門與非條約港地區（彰化與澎湖）有白銀往來，但因為資料不足，有待日後更多資料才能加以分析。

---

55 關於清帝國末期臺灣的金礦業，見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臺灣產業調查錄》（東京：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1896），頁 236-262。從晚清到日治初期，見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pp. 459-475.

56 東嘉生，《臺灣經濟史研究》，頁 323-331；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頁 107。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再進一步把北臺灣與各條約港、外貿國家作多年期累計計算，我們可以得出表四的梗概，大致上可以看出北臺灣與各地、各國之間的白銀貿易狀況。先就外國方面而言，北臺灣與香港之間白銀貿易雖然並非絕對多數，但在整體累計白銀貿易量則相當重要，分別佔白銀總進口 28.86%、白銀總出口 38.28%，並成為北臺灣第二大白銀往來地。至於北臺灣與之有白銀往來的其他清帝國條約港當中，廈門佔有絕大的重要性，比香港更甚。廈門的往來金額所佔比例遠超過其他港口，佔北臺灣白銀總進口的的 65.98%，更是北臺灣白銀總出口的 36.02%。北臺灣與廈門的白銀往來遠遠超出其他條約港的表現，例如進口第二大的「臺灣府／打狗」，只佔總進口額的 2.69%，出口第二名的福州，也只有出口總額的 9.65%；其他如汕頭、上海等就更形落後。

這個以廈門、香港為最大白銀貿易夥伴的情況，可能對於過去臺灣經濟史的研究者來說並不陌生。矢內原忠雄早已指出：「茶的輸出，自一八六九年英商 John Dodd 逕向紐約輸出約二十一萬斤起，頓為興盛；但後因以廈門為根據的洋行，獨佔臺茶的輸出，同時間為金融機構，勢力強大……。」[57]東嘉生除了更深入說明廈門的匯豐銀行與洋行如何進入北臺灣茶採購的供應鏈之外，也指出香港為當時臺灣樟腦出口最近的國際市場。[58]晚近學者黃富三、陳慈玉、林滿紅等，雖然重新審視臺灣開港時期外商洋行與華商、臺商之間的關係，強調臺灣的商業力量不斷成長，而非洋行方面的「獨佔」，但香港與廈門兩地的重要性依然未被否定。[59]所以，香港與北臺灣之間的白銀往來也是可以理解的。重點是北臺灣與廈門、香港之間的白銀進口比對相同兩港的出口為多，甚至在

57 矢內原忠雄，《帝国主義下の台湾》，頁 35；引文中文翻譯，見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臺北：帕米爾書店，1985），頁 33。

58 東嘉生，《臺灣經濟史研究》，頁 337-340。

59 黃富三，〈臺灣農商連體經濟的興起與蛻變（1630-1895）〉，收入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頁 3-36，特別是頁 17-25；陳慈玉，《台北縣茶業發展史》（板橋：稻鄉出版社，2004），頁 7-23；Lin, “Economic Ties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1860-1895,” pp. 1067-10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廈門白銀貿易的情況，是白銀貿易的總餘額（流入的白銀）為出口額的 5.2 倍。如此龐大的差異，已經不能以處理貿易金融來理解。這些大量流入的白銀，更準確的說，就是開發 19 世紀後半北臺灣經濟的「資本」。

表三　1865-1895 年通過淡水與基隆港之白銀流量

進口

年份	香港	上海	福州	寧波	臺灣府／打狗	廈門	汕頭	彰化	總額
1865	0	0	0	0	0	0	0	0	0
1866	0	0	0	0	0	0	0	0	0
1867	0	0	0	0	0	0	0	0	0
1868	0	0	0	0	0	3,000	0	0	3,000
1869	0	0	0	0	0	21,000	0	0	21,000
1870	0	800	12,000	0	0	6,500	0	0	19,300
1871	0	0	0	0	0	61,244	0	0	61,244
1872	144,500	0	37,500	0	14,500	135,600	15,800	0	347,900
1873	10,000	0	10,500	0	600	36,700	9,800	0	67,600
1874	52,600	0	0	0	22,000	290,677	0	0	365,277
1875	3,428	0	0	0	5,141	189,712	0	0	198,281
1876	0	0	0	0	2,571	427,927	728	0	431,225
1877	115,267	2,253	0	0	0	470,423	1,733	0	589,676
1878	91,508	0	0	0	7,627	627,853	0	0	726,988
1879	69,420	0	0	0	20,800	889,827	0	0	980,047
1880	250,131	0	0	4,333	0	666,444	0	0	920,908
1881	153,527	0	0	0	0	630,251	0	0	783,777
1882	229,725	0	0	0	0	703,511	0	0	933,236
1883	481,411	0	0	0	0	1002,525	0	0	1,483,936
1884	257,457	0	0	0	0	805,663	0	0	1,063,120
1885	709,376	0	0	0	0	1217,129	0	0	1,926,505
1886	747,531	0	0	0	0	1447,703	0	0	2,195,233
1887	555,264	0	0	0	0	1202,232	0	0	1,757,496
1888	529,967	0	0	0	0	819,345	0	0	1,349,312
1889	311,241	0	0	0	0	1038,327	6,327	0	1,355,895
1890	343,807	0	12,160	0	293,020	1140,772	12,653	0	1,802,412
1891	323,007	0	0	0	61,333	1025,752	11,137	0	1,421,229
1892	762,779	23,177	0	0	123,467	982,800	45,723	0	1,937,945
1893	912,177	0	0	0	145,460	1,244,800	52,000	0	2,354,437
1894	588,636	234,666	20,623	0	103,556	1,523,977	68,880	8,800	2,549,139
1895	951,600	140,000	0	0	0	1,033,953	3,556	0	2,129,1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出口

年份	香港	上海	福州	臺灣府／打狗	廈門	汕頭	澎湖	廣州	總額
1865	0	0	0	0	0	0	0	0	0
1866	0	0	0	0	0	0	0	0	0
1867	67,000	36,000	211,752	0	85,952	0	0	0	400,704
1868	10,000	0	201500	0	12,783	0	0	0	224,283
1869	53,000	0	95,200	0	32,000	0	0	0	180,200
1870	3,000	0	114,000	0	76,000	0	0	0	193,000
1871	0	0	183,663	0	66,585	0	0	0	250,248
1872	14,000	0	4,000	0	20,400	0	0	0	38,400
1873	77,150	0	10,000	0	117,600	0	0	0	204,790
1874	119,920	0	1,000	22,000	93,963	0	0	0	236,883
1875	84,244	0	0	0	93,771	0	0	0	178,015
1876	150,217	0	0	41,884	67,825	0	0	0	259,927
1877	108,028	0	3,900	17,767	47,055	0	0	0	176,749
1878	118,715	0	0	13,127	99,975	26,000	0	0	257,816
1879	104,329	0	0	1,991	91,284	42,467	0	0	240,071
1880	86,236	0	0	59,107	72,757	0	0	0	218,100
1881	102,871	0	0	0	122,465	0	0	0	225,336
1882	176,641	0	0	0	84,339	0	0	0	260,980
1883	117,760	0	0	0	115,603	0	0	0	233,363
1884	213,673	0	0	0	192,593	0	0	0	406,267
1885	78,679	0	0	0	55,429	0	0	0	134,108
1886	172,473	0	0	0	86,157	0	0	0	258,631
1887	194,981	0	0	0	158,796	0	0	0	353,777
1888	321,681	0	0	0	112,163	0	0	0	433,844
1889	175,941	260,640	5,460	0	54,215	1,300	0	0	497,556
1890	204,615	11,180	3,727	0	173,460	1,128	0	0	394,109
1891	139,488	867	2,600	0	189,421	6,069	0	0	338,445
1892	54,327	5,813	0	0	76,983	1,560	0	0	138,683
1893	27,248	8,889	0	114,311	148,007	1,688	2,667	0	302,809
1894	51,956	88,889	0	40,000	224,677	2,132	64,000	150,667	622,321
1895	292,836	49,777	0	184,889	352,087	2,400	0	133,333	1,015,323

單　位：銀圓（Dollar）

備　註：原「貿易統計」資料中的貨幣單位在 1870 年開始有以「海關兩」標示者，而在此之前有用「圓」或「兩」計算者，現均以「貿易統計」所提供的換算率$1＝HKTls.0.75換算為「圓」，折算後除去小數點後數字。

在 1881 年至 1888 年「廈門」項目之下，原資料顯示「廈門為主」（chiefly Amoy），亦即內容可能包含其他地方的數據，暫時一併計算在廈門之內。

資料來源：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Tamsui and Keelung*, 1866-18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四　淡水與基隆港白銀貿易累計與流動進出狀況（1865-1895）

地點	白銀總進口		白銀總出口		白銀流進（＋）流出（－）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香港	8,594,359	28.86	3,321,009	38.28	5,273,350
上海	26,230	1.35	462,055	5.33	-61,158.3
福州	92,783	0.31	836,802	9.65	-744,019
寧波	4,333	0.01	0	0	4,333
臺灣府／打狗	800,075	2.69	495,076	5.71	304,999
廈門	19,645,647	65.98	3,124,345	36.02	16,521,302
汕頭	228,337	0.77	84,744	0.98	143,593
彰化	8,800	0.03	0	0	8,800
澎湖	0	0	66,667	0.77	-66,667
廣州	0	0	284,000	3.27	-284,000
累計	29,775,227	100	8,674,738	100	21,100,489

單　位：圓（Dollar）

備　註：原「貿易統計」資料中的貨幣單位在 1875 年開始有以「海關兩」標示者，而在此之前有用「圓」或「兩」計算者，現均以「貿易統計」所提供的換算率$1＝HKTls.0.75換算為「圓」。

1881-1888 年「廈門」項目之下，原資料顯示「廈門為主」（chiefly Amoy），亦即內容可能包含其他地方的數據，暫時一併計算在廈門之內。百分比計算，原則上採取小數點後兩位數，再以四捨五入計算。過程中「出口」部分總數超過 0.01，亦以四捨五入法處理。

資料來源：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Tamsui and Keelung*, 1866-1896.

南臺灣的白銀流動方向，其內容雖然亦是多方面的，基本以香港、日本與清帝國其他條約港之間往來互見，但與北臺灣大相逕庭。從表五可見，南臺灣的白銀貿易在與外國方面，除了英國殖民地香港之外，還有日本。早在 16、17 世紀，日本所產白銀即已成為東亞各地貿易往來的重要環節。[60]其後德川幕府限制白銀出口，日本白銀在外流通量因而減少。[61]所以，在開港通商以前，清帝國下的臺灣貨幣史並未提到日本銀貨的紀錄。但日本 1871 年開始製造「日本銀圓」，以與墨西哥「鷹洋」

60 William S. Atwell, “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1650,” *Past and Present* 95 (1982), pp. 68-95.

61 小葉田淳，《日本の貨幣》（東京：至文堂，1958），頁 127-137。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資料庫

進行「貨幣戰」，加上貿易上運載白銀，也就構成南臺灣日本白銀的紀錄。[62]至於香港，因作為歐美資本在東亞營運的基地，當然也與南臺灣往來甚多。而在眾多的清帝國條約港當中，與南臺灣地緣、歷史關係最深的廈門顯得至為重要，遠比清帝國中、北部的上海、寧波、天津，甚或是福建省府福州更為重要。

再進一步把南臺灣與各條約港、外貿國家之間的白銀貿易累計，可以得出表六，大致可以看出南臺灣與各地、各國之間的白銀貿易狀況。先就外國方面而言，與北臺灣最大的差異在於與日本的往來。當然，南臺灣與香港之間存在密切關係，香港在南臺灣總體白銀貿易中佔有重要地位（總進口 31.15%、總出口 21.18%）。至於日本，其與南臺灣之白銀貿易的特別之處在於，雖然進口額並沒有像香港般龐大（只佔總進口額 5.31%），卻只有向南臺灣送出、而沒有進口白銀，故成為南臺灣白銀進口的第三大供應者，並為南臺灣「只進不出」的白銀重要來源。

至於南臺灣與清帝國條約港方面，則與對外國方面大為不同。這些條約港絕大部分與南臺灣有來有往（天津、廣州除外），其中廈門的往來金額所佔比例最重，佔南臺灣白銀總進口的 53.04%，更是白銀總出口的 69.93%。次於廈門的是淡水，所佔比例卻被廈門遠遠拋離（總進口與總出口均為 4%左右）。排行第三位的汕頭，就更形落後（佔總進口 3.52%、總出口 2.74%）。

若將白銀進出口收支並列，如同表六最後一欄所示，南臺灣與清帝國條約港之間的白銀貿易，竟然出現嚴重外流的狀況。最嚴重的就是對廈門的部分，白銀外流額達到 3,410,056 圓。雖然像廈門一樣有白銀外流的其他條約港只有三個（福州、淡水、廣州），而且與餘下的條約港、外國之間均處於白銀流入狀態，但在這些不同地區、港口的數字作加減

62 關於日本製造「日本圓銀」，參見 Eduard Kann, *The Currencies of China: An Investig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Transactions Affecting China* (Shanghai: Kelly & Walsh, Ltd., 1926), pp. 136-137; 關於墨西哥銀圓的「貨幣戰」，見小野一一郎，《近代日本幣制と東アジア銀貨圏——円とメキシコドル》（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0），頁 113-1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資料庫

之後，廈門還是對南臺灣整體的白銀貿易數字造成嚴重的打擊，成為南臺灣白銀外流的主因。

表五　1863-1895 年通過「臺灣府」與打狗港（臺南關）之白銀流量

進口

年份	香港	日本	上海	寧波	福州	廈門	汕頭	淡水	天津	總額
1863	0	0	0	0	0	44,275	0	0	0	44,275
1864	0	0	15,000	28,600	6,000	68,000	28,000	0	0	145,600
1865	3,000	25,000	0	0	6,100	95,194	0	0	0	129,294
1866	0	0	0	0	0	15,100	0	0	0	15,100
1867	0	5,600	0	0	0	44,100	0	0	0	49,700
1868	6,000	0	37,908	49,000	0	20,800	0	0	0	113,708
1869	0	0	0	0	0	116,150	0	0	0	116,150
1870	60,000	11,000	38,600	27,100	46,500	331,630	0	0	10,000	524,830
1871	37,900	29,000	20,699	11,300	0	278,202	2,930	0	0	380,031
1872	138,435	0	15,180	9,000	0	230,850	67,360	0	0	460,825
1873	70,000	0	0	0	0	221,400	32,500	8,000	0	331,900
1874	232,500	97,900	0	0	3,000	370,729	157,500	38,000	0	899,629
1875	97,744	78,719	0	0	0	123,928	62,051	2,181	0	364,623
1876	87,447	147,576	10,472	0	2,619	257,336	70,776	55,747	0	631,972
1877	111,708	18,327	0	0	25,483	282,220	37,353	16,145	0	491,236
1878	118,176	0	0	0	8,727	114,372	8,727	13,572	0	263,573
1879	157,265	107,344	10,472	0	17,455	572,817	8,895	36,655	0	910,903
1880	587,159	81,032	0	0	0	504,391	1,740	44,512	0	1,218,833
1881	191,877	41,889	0	0	0	182,304	1,745	48,959	0	466,775
1882	317,312	0	733	1,047	6,981	214,357	0	4,364	0	544,795
1883	489,217	45,381	5,847	0	0	278,588	0	23,692	0	842,725
1884	300,583	42,764	0	0	7,853	348,937	1,832	12,043	0	714,012
1885	47,616	10,472	6,981	0	0	395,552	0	0	0	460,621
1886	106,204	0	17,455	0	0	163,432	0	3,141	0	290,232
1887	125,316	0	0	0	0	63,151	0	1,309	0	189,776
1888	313,679	40,145	0	0	0	160,161	873	699	0	515,557
1889	116,941	7,855	1,413	0	0	158,163	0	0	0	284,372
1890	256,271	0	0	0	0	314,385	0	0	0	570,656
1891	95,036	0	0	0	0	219,843	0	0	0	314,879
1892	117,072	0	0	0	0	225,484	6,847	0	0	349,403
1893	21,819	0	0	0	0	377,455	4,364	60,839	0	464,476
1894	363,536	0	3,029	10,908	0	758,575	50,523	0	0	1,186,571
1895	63,707	0	0	4,848	0	448,835	7,029	252,117	0	776,53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出口

年份	香港	上海	寧波	福州	廈門	汕頭	淡水	廣州	總額
1865	96,000	0	0	0	211,235	0	2,500	0	309,735
1866	9,000	0	0	0	397,055	0	6,000	0	412,055
1867	0	0	0	34,000	220,000	0	0	0	254,000
1868	18,000	0	0	0	487,594	20,000	0	0	525,594
1869	0	0	0	0	248,262	0	0	0	248,262
1870	0	0	0	0	95,500	0	0	4,000	99,500
1871	22,000	0	15,500	10,300	89,000	0	0	350	137,150
1872	0	0	0	0	215,940	0	18,500	0	234,440
1873	17,500	0	0	0	166,950	0	50,000	0	234,450
1874	24,692	0	0	0	331,955	0	0	0	356,647
1875	34,952	0	0	0	646,108	0	7,419	0	688,479
1876	109,413	3,491	0	0	464,545	873	4,364	0	582,687
1877	158,769	0	0	0	439,112	6,588	2,619	0	607,088
1878	226,684	2,395	0	7,767	468,282	13,825	10,876	0	729,829
1879	276,009	0	0	5,269	392,109	2,443	26,903	0	702,733
1880	248,089	279	0	3,176	362,739	13,839	873	0	628,995
1881	333,156	2,617	0	8,203	643,804	27,400	1,091	0	1,016,271
1882	217,289	436	0	3,645	548,409	19,984	0	0	789,764
1883	151,865	217	0	6,459	389,412	27,715	0	0	575,668
1884	188,196	16,929	0	22,833	459,552	11,349	1,745	0	700,605
1885	120,681	0	0	7,855	148,597	18,668	0	0	295,801
1886	305,196	0	0	873	424,124	70,500	5,236	0	805,929
1887	219,133	0	0	10,944	421,087	43,963	11,956	0	707,083
1888	70,975	4,799	0	12,959	263,733	25,056	5,323	0	382,844
1889	111,031	699	0	4,604	375,179	38,355	10,297	0	540,164
1890	96,861	0	0	5,660	492,828	14,659	219,972	0	829,980
1891	137,480	0	0	3,995	501,011	37,051	61,333	0	740,869
1892	90,839	0	0	3,579	372,028	22,341	70,133	0	558,920
1893	59,271	0	0	2,269	316,924	16,756	145,447	0	540,667
1894	51,313	3,491	0	3,761	532,232	10,707	100,691	0	702,195
1895	26,880	2,592	0	1,657	173,189	0	13,833	0	218,152

單　位：銀圓（Dollar）

備　註：原資料在 1875 年以後貨幣單位標示為「海關兩」，現全以 0.75 折算為圓，折算後除去小數點後數字。

資料來源：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Takow and Taiwan-foo [Tainan]*, 1864-18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六 「臺灣府」與打狗港（臺南關）白銀貿易累計與流動進出狀況（1865-1895）

地點	白銀總進口		白銀總出口		白銀流進（＋）流出（－）
	金 額	百分比(%)	金 額	百分比(%)	
香港	4,633,519	31.15	3,421,274	21.18	1,212,245
日本	790,004	5.31	0	0	790,004
上海	168,790	1.13	37,945	0.23	130,845
寧波	113,203	0.76	15,500	0.10	97,703
福州	124,717	0.84	159,808	0.99	-35,091
廈門	7,888,440	53.04	11,298,496	69.93	-3,410,056
汕頭	523,045	3.52	442,072	2.74	80,973
淡水	621,975	4.18	777,111	4.81	-155,136
天津	10,000	0.07	0	0	10,000
廣州	0	0	4,350	0.01	-4,350
累計	14,873,693	100	16,156,556	100	-1,282,863

單 位：圓（Dollar）

備 註：原「貿易統計」資料中的貨幣單位在 1875 年開始有以「海關兩」標示者，而在此之前有用「圓」或「兩」計算者，現均以「貿易統計」所提供的換算率$1＝HKTls.0.75換算為「圓」。

百分比計算，原則上採取小數點後兩位數，再以四捨五入計算。過程中「出口」部分總數超過 0.02，亦以四捨五入法處理。

資料來源：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Takow and Taiwan-foo [Tainan]*, 1866-1896.

當然，我們可以再次回到海關官員對南臺灣白銀流動的觀察，理解這些數字之間的關係。前述「臺南關」《十年報告，1882-91》的描述是：「一旦購糖量已經達到時，就沒有對銀圓的需求，而貨幣就會被再送往廈門。」[63]而日本在南臺灣採購糖品，也可能直接把白銀作為採購時的「現金」（Cash），然而多餘的日本白銀理應回流日本。但從貿易統計所呈現的事實是，南臺灣從日本進口的白銀，從不會回到日本。而且，在開港時代的南臺灣，縱使有極少數日本人短暫留滯，並沒有日本「商社」的開設，糖品輸出至日本，全仰賴從香港、南臺灣到日本港口的多

63 Montgomery, “Tainan: Decennial Report, 1882-91,” pp. 480-4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群「中介」商人、商社與商船促成。[64]所以，南臺灣自日本輸入的白銀，留在南臺灣作為購糖「資金」的同時，也可供商人在其他業務上作為匯兌、投資之用。

如果再比對前述北臺灣與廈門之間白銀流動的數據，北臺灣與廈門之間的白銀總流動量是 22,769,992 圓，南臺灣為 19,186,936 圓，但流動方向完全相反。北臺灣是白銀從廈門流入，南臺灣卻是把白銀流向廈門，而且廈門流入北臺灣的白銀，是南臺灣流出到廈門的白銀的 484%。換言之，在近代臺灣與廈門之間的金流往來，呈現南、北差異，北臺灣依靠廈門流入白銀，輸出商品透過廈門轉往世界，南臺灣則輸出白銀（資本），儼然形成兩個幾近斷裂的商業網絡體系，縱使有一定的聯繫，但各自有運作的機制。這種現象，成為南臺灣與北臺灣之間最大的差異。

五、回歸資本帳

白銀流動的問題最後無可避免地要面對的是，一個貿易單位（國家、地區與港市）必定要涉及資本帳的問題，因為那是經濟表現的重要指標。就算是清帝國海關的統計亦早已注意到，但以「貿易價值」（Value of Trade，或如圖五的 Summary of the Whole Trade）來呈現，關注的是商品進出口貿易與貴金屬的流動。在近代臺灣經濟史中，第一次出現地區性貿易收支資本帳的紀錄，是清領時期臺灣唯一的《十年報告》淡水關的部分，其所包含的項目除了淨進、出口貿易金額、貴金屬金額之外，尚包括從進、出口貿易中可抽到的稅金（包括關稅與釐金）。[65]至於現

64 陳計堯，〈人流、物流、金流：條約港體制下日本與南臺灣的經貿關係（1865-1894）〉，《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第 18 期（2019 年 11 月，臺南），頁 7-67。

65 H. B. Morse, “Tamsui: Decennial Report, 1882-91,”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 Navigation, Industries, Etc., 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in China and Corea, and on the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 1882-91*, pp. 433-462, particularly p. 448.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代很多與資本帳相關的數據（如匯兌、投資金等）並無相關統計，實在難以與當代的分析相提並論。但白銀流動的數據一直存在，可以讓我們初步理解晚清開港 30 年貿易收支，加入資本帳後的情況。

這方面我們再次利用清帝國海關「貿易統計」北臺灣歷年貴金屬的進出口金額，經過折算後整理為表七。為了同時展示貿易資本帳的情況，一併列出貿易收支。至於關稅與釐金，因為涉及更廣泛的財政問題，暫時擱置。根據表七各項數據可觀察到的是，北臺灣的白銀從 1870 年代初期開始，長期處於流入狀態，並在 1880 年代攀升到新的水平。而在同時期的商品貿易，也處於長期順差。

雖然，這種長期順差狀態並非橫跨「開港」時代 30 年，而是在 1876 年產生。縱使 1894 年商品貿易出現短暫的逆差，白銀的流入還是為北臺灣的貿易收支提供支援。更重要的是，白銀流動的累計流入額甚至比商品貿易的累計順差為高，差額達到 200 萬圓。這些龐大的白銀流量，顯然已經超過貿易盈餘所可能需要以貴金屬支付的部分。在北臺灣商品貿易持續獲利與成長的情況下，與其說這是與商品貿易的對價支付，它更像多餘的資本正在北臺灣尋找投資機會。

至於南臺灣商品貿易表現加入貴金屬（基本上是白銀）因素之後的情況，我們同樣利用清帝國海關「貿易統計」南臺灣歷年商品貿易與貴金屬的進出口金額，經過折算後整理為表八。從中可以發現南臺灣的白銀貿易，從 1865 年海關正式營運開始至 1895 年改隸日本為止，基本上呈現白銀外流的情形。在被討論的 31 年裡，就有 17 年是處於白銀出口的狀態，只有 14 年是白銀流入，流出總金額竟達 1,282,860 圓之譜。縱然南臺灣條約港在商品貿易上是有盈餘的，加上白銀流動後，仍然存在接近 30 萬圓的缺口。換言之，南臺灣在商品貿易處於有貿易盈餘的情況下，仍然出現白銀外流的現象，這些白銀流動的意義就不能單以商品貿易視之，基本上更貼近貴金屬（即「財富」、「資本」）外流的狀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七　淡水與基隆港貿易收支與白銀流動（1865-1895）

年度	白銀總進口	白銀總出口	白銀流入（＋）/流出（－）	商品貿易盈虧	商品貿易盈虧＋白銀流動流入（＋）/流出（－）
1865	0	0	0	-386,921	-386,921
1866	0	0	0	-603,378	-603,378
1867	0	400,704	-400,704	-742,577	-1,143,281
1868	3,000	224,283	-221,283	-372,852	-594,135
1869	21,000	180,200	-159,200	-385,607	-544,807
1870	19,300	193,000	-173,700	-235,589	-409,289
1871	61,244	250,248	-189,004	-280,848	-469,852
1872	347,900	38,400	309,500	80,420	389,920
1873	67,600	204,790	-137,190	-514072	-651,262
1874	365,277	236,883	128,394	-446,688	-318,294
1875	198,281	178,015	20,266	-271,750	-251,484
1876	431,225	259,927	171,298	28,012	199,310
1877	589,676	176,749	412,927	153,145	566,072
1878	726,988	257,816	469,172	390,394	859,566
1879	980,047	240,071	739,976	718,698	1,458,674
1880	920,908	218,100	702,808	959,573	1,662,381
1881	783,777	225,336	558,441	900,473	1,458,914
1882	933,236	260,980	672,256	1,455,416	2,127,672
1883	1,483,936	233,363	1,250,573	1,537,916	2,788,489
1884	1,063,120	406,267	656,853	1,563,282	2,220,135
1885	1,926,505	134,108	1,792,397	1,311,862	3,104,259
1886	2,195,233	258,631	1,936,602	1,857,545	3,794,147
1887	1,757,496	353,777	1,403,719	1,519,816	2,923,535
1888	1,349,312	433,844	915,468	603,826	1,519,294
1889	1,355,895	497,556	858,339	1,209,833	2,068,172
1890	1,802,412	394,109	1,408,303	1,455,673	2,863,976
1891	1,421,229	338,445	1,082,784	1,196,889	2,279,673
1892	1,937,945	138,683	1,799,262	1,447,665	3,246,927
1893	2,354,437	302,809	2,051,628	2,257,941	4,309,569
1894	2,549,139	622,321	1,926,818	1,991,702	3,918,520
1895	2,129,109	1,015,323	1,113,786	-18,893	1,094,893
累計	29,775,227	8,674,738	21,100,489	18,380,906	39,481,395

單　位：銀圓（Dollar）

備　註：原資料在 1870 年以後貨幣單位標示為「海關兩」，現全以 0.75 折算為圓，折算後除去小數點後數字；「白銀流動」指白銀流入與流出。若白銀進口金額大於白銀出口，即白銀「流入」；反之，若出口大於進口，即白銀「流出」。

資料來源：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Tamsui and Keelung*, 1865-18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八 「臺灣府」／打狗港／臺南關商品貿易收支狀況與白銀流動（1865-1895）

年度	白銀總進口	白銀總出口	白銀流入（＋）／流出（－）	商品貿易盈虧	商品貿易盈虧＋白銀流動流入（＋）／流出（－）
1865	129,294	309,735	-180,441	-340,263	-520,704
1866	15,100	412,055	-396,955	-421,086	-818,041
1867	49,700	254,000	-204,300	-417,759	-622,059
1868	113,708	525,594	-411,886	-46,205	-458,091
1869	116,150	248,262	-132,112	-174,262	-306,374
1870	524,830	99,500	425,330	557,808	983,138
1871	380,031	137,150	242,881	129,527	372,408
1872	460,825	234,440	226,385	307,136	533,521
1873	331,900	234,450	97,450	33,854	131,304
1874	899,629	356,647	542,982	140,644	683,626
1875	364,623	688,479	-323,856	-149,213	-473,069
1876	631,973	582,686	49,287	177,557	226,844
1877	491,236	607,088	-115,852	-249,032	-364,884
1878	263,574	729,829	-466,255	-335,916	-802,171
1879	910,903	702,733	208,170	437,209	645,379
1880	1,218,834	628,995	589,839	792,816	1,382,655
1881	466,774	1,016,271	-549,497	-735,839	-1,285,336
1882	544,794	789,763	-244,969	-182,914	-427,883
1883	842,725	575,668	267,057	489,602	756,659
1884	714,012	700,604	13,408	593,661	607,069
1885	460,621	295,801	164,820	-429,004	-264,184
1886	290,232	805,929	-515,697	-580,833	-1,096,530
1887	189,776	707,083	-517,307	-507,272	-1,024,579
1888	515,557	382,845	132,712	141,525	274,237
1889	284,372	540,165	-255,793	-127,558	-383,351
1890	570,656	829,980	-259,324	441,196	181,872
1891	314,879	740,870	-425,991	183,018	-242,973
1892	349,403	558,920	-209,517	176,362	-33,155
1893	464,477	540,667	-76,190	-202,889	-279,079
1894	1,186,571	702,195	484,376	443,468	927,844
1895	776,536	218,151	558,385	840,875	1,399,260
累計	14,873,695	16,156,556	-1,282,860	986,213	-296,647

單　位：銀圓（Dollar）

備　註：原資料在 1875 年以後貨幣單位標示為「海關兩」，現全以 0.75 折算為圓，折算後除去小數點後數字；「白銀流動」指白銀流入與流出。若白銀進口金額大於白銀出口，即白銀「流入」；反之，若出口大於進口，即白銀「流出」。

資料來源：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Takow and Taiwan-foo [Tainan]*, 1866-18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結　語

從上述的分析可知，近代臺灣的貿易表現，曾經作為南、北臺灣經濟發展不平均的重要指標，甚至成為臺灣「歷史重心的北移」的重要證據。但在「歷史重心北移」論以外，臺灣南、北貿易表現如何？本文論證當我們注意 19 世紀後半臺灣貿易史裡的白銀問題，就必須同時考慮貿易系統頂端的跨國商社所面臨的金、銀兌價波動問題。某個程度上，因為臺灣使用白銀，而容易忽略金價波動的影響。本文並沒有全面檢討雷麥所論清帝國以白銀計價的出口金額受到刺激而增加，並因而減少進口金額的發展趨勢，也並非如李泰初要對海關資料背後的邏輯加以質疑與批判，但對於如濱下武志所提出金價波動所帶來的影響，則嘗試以商業風險與潛在收益的角度分析，並對臺灣的出口產業與金本位的關係加以分類。可以說，因為銀價下跌的關係，把臺灣以白銀計價的商品輸往金本位的國家，正是一項營利日漸豐厚但風險日益增加的投資。

另一方面，本文透過重新計算清帝國海關記錄之臺灣南、北兩地白銀流動額，並評估在貿易收支之外，白銀流動額對兩地貿易資本帳的影響。結果是南臺灣出現因資本（白銀）外流，造成縱使出現商品貿易順差、但仍然有資本帳虧損的情況。反而北臺灣一直是在貿易順差的同時，存在大量白銀流入的情形。這些現象的背後，又如何讓我們重新理解臺灣南、北兩地在「開港」時代的貿易表現？關鍵在於南臺灣的白銀流出現象直接改變其商品貿易的順差，形成貿易資本帳總額的虧損，不只與北臺灣出現差異，也讓人必須更深層地思考貿易表現背後的經濟結構。

當然，單從南、北臺灣港口城市及其腹地的個別貿易表現與白銀流動之關係，可以看到北臺灣的商品貿易表現表面上比南臺灣為豐碩，但白銀流動的因素讓南、北的貿易表現在商品貿易之外，增加貴金屬所代表的貨幣、商品與資本的角色。南、北在面對相同衝擊時的白銀流動狀態差異，也反映南、北兩地經濟結構的不同。再深究白銀流動的方向，

臺灣大學 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南、北臺灣均與廈門有深厚而密切的往來，但南臺灣是把白銀流向廈門，北臺灣則一直以廈門為主要吸收白銀的來源，而白銀流動方向與總體白銀流動的情況相近。所以，廈門的重要性同時可達北臺灣與南臺灣，但性質完全不同，使之在成為左右臺灣全島商品與白銀貿易之絕對關鍵的同時，又是南、北臺灣兩個幾近斷裂的商業網絡體系的重疊點。

白銀貿易的趨勢對北臺灣來說，或許是商品貿易的利益豐厚而吸引更多的投資，資本大量地湧進北臺灣。但南臺灣的商品貿易與白銀貿易呈現相反的發展方向，商品貿易順差、白銀貿易逆差的明顯差異，象徵意義恐怕不單純是「外流」，也可以是「外溢」或「對外投資」以獲取更豐厚的利潤，畢竟白銀（尤其是銀圓）本身可以作為一種商品，而南臺灣與廈門之間的「銀－銀」兌換價，可能已經造成誘因，驅使較昂貴的銀幣往廈門輸出。[66]南臺灣輸往廈門的白銀，亦有可能成為直接投資，通往更廣的商業世界。有趣的是，雖然南、北臺灣海關對於白銀流動的紀錄不一，但島內白銀流動方向卻甚為一致——南臺灣的白銀（資金）北移。從這個角度來說，與其說南臺灣在經濟上逐漸沒落，不如說南臺灣已經達到一定程度的發展，成為一個可輸出資本的相對成熟市場。

關於南臺灣成為一個相對成熟的資本市場，尤其是對廈門方面的關係，我們目前所知甚少，實在有待日後更多的研究。但臺南府城不但鉅商聚集，府城內的店鋪地契，甚至成為洋商收取作為商人擔保品之用，與同時代上海外灘使用「道契」作為一種融資手段，如出一轍。[67]府城

66 陳計堯，〈「條約港制度」下南臺灣與廈門的商品貿易與白銀流動（1863 到 1895 年）〉，頁 26-30。

67 例如：羅特斯與荷斯洛普（Lautes & Hoeslop）洋行與沈俊「委託販賣」關係之擔保品收據（1889 年 8 月 24 日），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糖業舊慣一斑附錄參考書》（與《臺灣糖業舊慣一斑》合刊，神戶：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08），頁 120-121。關於「道契」在近代上海商業融資上的作用，見 Tomoko Shiroyama, “The Shanghai Real Estate Market and Capital Investment, 1860-1936,” in *Treaty Port Economy in Modern China: Empirical Studie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ed. Billy K. L.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資料庫

商人的放貸與匯兌事業，更受到清帝國海關洋員的注意。[68]與府城有業務往來的打狗商人，亦曾遠赴日本橫濱推銷糖品。[69]凡此種種，均令人思考南臺灣資本市場的各種可能。

總而言之，在「開港」時代臺灣南、北兩處的四個條約港，其貿易表現不能單從商品貿易本身而定，還需要考慮白銀流動所帶來的意義，其背後則是以黃金為本位的關係，以及以貴金屬為象徵的資本流動狀況，從中可以對近代臺灣經濟與貿易史作更多面向的觀察。在「開港」時代的臺灣白銀流動，是我們深度理解臺灣經濟關係、制度與結構時的鑰匙。

*本文的初期版本，曾於 2019 年 5 月 18 日在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主辦、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協辦之「府城深耕五十年　成就世界續百年：國立成功大學 2019 年『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得到林玉茹教授的寶貴意見，另外在撰寫期間，得到陳文松教授、謝美娥教授、曾文亮教授與「開放的臺灣史研究會」成員提供寶貴意見與鼓勵。林宜璇小姐、曾于銓先生在資料收集上的幫忙，以及各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責任編輯：吳昌峻　校對：黃方碩　詹前倬）

So and Ramon H. Myers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11), pp. 47-74.

68 Montgomery, “Tainan: Decennial Report, 1882-1891,” p. 488.

69 例如陳福謙、陳中和。見伊藤泉美提供，趙祐志整理，〈「順和棧」在橫濱（1864-1914）〉，《重高學報》第 3 期（2000 年 6 月，三重），頁 193-211；張守真、楊玉姿，《陳中和新傳》（高雄：麗文文化事業公司，2014），頁 17；李佩蓁，〈臺灣糖業鉅子陳北學〉，《國史研究通訊》第 2 期（2012 年 6 月，臺北），頁 43-49；李佩蓁，〈依附抑合作？清末臺灣南部口岸買辦商人的雙重角色（1860-1895）〉，《臺灣史研究》第 20 卷第 2 期（2013 年 6 月，臺北），頁 31-76。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貨幣流通景況報告ノ件（元臺南縣）〉（1897 年 7 月 1 日），《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9785 冊，文號 002，http://ds3.th.gov.tw/ds3/app000/（2018 年 9 月 21 日檢索）。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海關總署辦公廳、中國舊海關史料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舊海關史料（1859-1948）》。北京：京華出版社，2001。

林玉茹、劉序楓編，《鹿港郊商許志湖家與大陸的貿易文書（一八九五—一八九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6。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1910。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二》。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1910。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三》。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1911。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四》。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1911。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五》。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1911。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六　營口》。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1910。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　第壹》。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1912。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1909。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編，《續北滿洲經濟調查資料》。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1911。

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等編，《清末台灣海關歷年資料（*Maritime Customs Annual Returns and Reports of Taiwan, 1867-1895*）》。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

臺灣總督府編纂，《台湾外国貿易年表》（明治 44 年至昭和 14 年），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http://dl.ndl.go.jp/（2016 年 3 月 19 日檢索）。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統計書》（明治 30 年至昭和 19 年），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http://dl.ndl.go.jp/（2016 年 4 月 10 日檢索）。

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臺灣產業調查錄》。東京：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1896。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編，《臺灣總督府第一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8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編，《臺灣總督府第二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900。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編，《臺灣總督府第三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901。

臺灣總督府財務局金融課，《臺灣の金融》。臺北：臺灣總督府財務局金融課，1930。

蔡長劍策劃，蔡長安編著，《東石源利族人徙台貨殖書契》。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糖業舊慣一斑附錄參考書》，與《臺灣糖業舊慣一斑》合刊。神戶：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08。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Publications, 1860-1948.*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1970.

Hirth, F. "Tamsui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90."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of the Treaty Ports and Trade Reports for the Year 1890*, pp. 318-321.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91.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Foreign Trade of China, 1931,* Part 1*: Report 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32.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Tamsui - Formosa, for the Year 1865*. Shanghai: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Press, 1866.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s of Tamsui & Keelung, - Formosa, for the Year 1866*. Shanghai: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Press, 1867.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Tamsui and Keelung, - Formosa."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for the Year 1867*. Shanghai: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Press, 1868.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Tamsui and Keelung, - Formosa."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1868-1870*. Shanghai: The Customs' Press, 1869-1873.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Tamsui, - Formosa."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1871-1876*. Shanghai: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tatistical Department, 1874-1877.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Tamsui."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1877*.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1878.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Tamsui, - Formosa."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1878-1881*. Shanghai: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tatistical Department, 1879-1882.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Tamsui Trade Returns."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and Trade Reports, 1882-1895*.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1883-18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Takou – Formosa, Under Provisional Regulations from 26th October, 1863, to 5th May, 1864 and From 5th May, to 31st December, 1864*. Shanghai: A. H. de Carvalho Printer & Stationer, 1864.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s of Takow & Taiwan-foo, - Formosa, for the Year 1865*. Shanghai: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Press, 1866.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s of Takow & Taiwan-foo, - Formosa, for the Year 1866*. Shanghai: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Press, 1867.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Takow and Taiwan-foo, - Formosa."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for the Year 1867*. Shanghai: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Press, 1868.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Takow and Taiwan-foo, - Formosa."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1868-1872*. Shanghai: The Customs' Press, 1869-1873.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Takow, - Formosa."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1873-1876*. Shanghai: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tatistical Department, 1874-1877.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Takow, - Formosa."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1877-1881*.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1878-1882.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Takow Trade Returns."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and Trade Reports, 1882-1890*.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1883-1891.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Tainan Trade Returns."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and Trade Reports, 1891-1895*.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1892-1896.

Jarman, Robert L., ed.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5 vols. London: Archive Editions, 1997.

Man, J. Alex. "Takow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68."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for the Year 1868*, pp. 75-81. Shanghai: The Customs' Press, 1869.

Montgomery, P. H. S. "Tainan: Decennial Report, 1882-91."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 Navigation, Industries, Etc., 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in China and Corea, and on the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 1882-91*, pp. 463-494.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93.

Morse, H. B. "Tamsui: Decennial Report, 1882-91."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Decennia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eports on the Trade, Navigation, Industries, Etc., 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in China and Corea, and on the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 1882-91, pp. 433-462.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93.

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Ritchie, Hugh and Elizabeth）著，蘇約翰（John Schufelt）主編、導讀，林淑琴譯，《李庥與伊麗莎白・李庥宣道書信集》（*The Mission Correspondence of Hugh and Elizabeth Ritchie*）。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9。

Spinney, W. F. “Takow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93.”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and Trade Reports for the year 1893*, pp. 373-376.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94.

Taintor, E. C. “Tamsui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68; together with Addendum for the Year 1869.”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for the Year 1869*, pp. 157-170. Shanghai: The Customs’ Press, 1870.

Woodruff, F. E. “Amoy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80.” In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for the Year 1880*, pp. 211-237.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1881.

Yang, C., H. B. Hau, et. al., comp. *Statistics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during the Last Sixty-five Years.* Shanghai: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1931.

二、近人研究

王世慶，〈十九世紀中葉臺灣北部銀錢比價變動初探〉，收入陳秋坤、洪麗完主編，《契約文書與社會生活（1600-1900）》，頁 141-172。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

伊藤泉美提供，趙祐志整理，〈「順和棧」在橫濱（1864-1914）〉，《重高學報》第 3 期，2000 年 6 月，三重，頁 193-211。

吳聰明、葉淑貞、劉鶯釧編，《日本時代臺灣經濟統計文獻目錄》。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1995。

李佩蓁，〈臺灣糖業鉅子陳北學〉，《國史研究通訊》第 2 期，2012 年 6 月，臺北，頁 43-49。

李佩蓁，〈依附抑合作？清末臺灣南部口岸買辦商人的雙重角色（1860-1895）〉，《臺灣史研究》第 20 卷第 2 期，2013 年 6 月，臺北，頁 31-76。

李泰初，〈有關中國近代對外貿易若干問題之商榷〉，《珠海學報》第 2 期，1964，香港，頁 174-287。

李祖基編，《近代臺灣地方對外貿易》。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李冕世、黃典權，〈清代臺灣貨幣制度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歷史學報》第 3 號，1976 年 7 月，臺南，頁 1-54。

周憲文編著，《臺灣經濟史》。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8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林仁川、黃福才，《臺灣社會經濟史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1。
林文凱，〈再論清代臺灣開港以前米穀輸出問題〉，收入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頁 99-133。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中和：知書房，1996。
林玉茹，〈商業網絡與委託貿易制度的形成——十九世紀末鹿港泉郊商人與中國內地的帆船貿易〉，《新史學》第 18 卷第 2 期，2007 年 6 月，臺北，頁 61-102。
林玉茹，〈從屬與分立：十九世紀中葉臺灣港口城市的雙重貿易機制〉，《臺灣史研究》第 17 卷第 2 期，2010 年 6 月，臺北，頁 1-37。
林玉茹，〈日據時期臺灣的稅關資料及其運用〉，收入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主編，《國家航海》第 16 輯，頁 82-12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林玉茹，〈開港前後臺灣南北雙核心區域型經濟區的形成與發展（1851-1895）〉，《地域文化研究》2017 年第 3 期，長春，頁 12-51。
林東辰，《臺灣貿易史》。臺北：成文出版社，1999 重印本。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
袁穎生，《臺灣光復前貨幣史述》。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張守真、楊玉姿，《陳中和新傳》。高雄：麗文文化事業公司，2014。
陳計堯，〈「條約港制度」下南臺灣與廈門的商品貿易與白銀流動（1863 到 1895 年）〉，《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第 7 期，2014 年 5 月，臺南，頁 5-36。
陳計堯，〈人流、物流、金流：條約港體制下日本與南臺灣的經貿關係（1865-1894）〉，《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第 18 期，2019 年 11 月，臺南，頁 7-67。
陳慈玉，《台北縣茶業發展史》。板橋：稻鄉出版社，2004。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曾品滄，〈塭與塘：清代臺灣養殖漁業發展的比較分析〉，《臺灣史研究》第 19 卷第 4 期，2012 年 12 月，臺北，頁 1-47。
曾澤祿，《臺灣貨幣的精神與文化》，嘉義：自刊本，2004。
黃富三，〈臺灣農商連體經濟的興起與蛻變（1630-1895）〉，收入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頁 3-36。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
楊佳瑜，〈日治時期台灣幣制改革與台灣人貨幣觀念的轉變〉。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葉振輝，《清季臺灣開埠之研究》。臺北：標準書局，1985。
鄭友揆，〈我國海關貿易統計編製方法及其內容之沿革攷〉，《社會科學雜誌》第 5 卷第 3 期，1934，北平，頁 295-296。
鄭永昌，〈清代前期臺灣貨幣流通的發展與變遷（1684-1800）〉，《故宮學術季刊》第 19 卷第 1 期，2001 年秋，臺北，頁 227-261。
戴寶村，《近代臺灣海運發展：戎克船到長榮巨舶》。臺北：玉山社，20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謝美娥，《清代臺灣米價研究》。板橋：稻鄉出版社，2008。
大英博物館著，周全譯，《金錢的歷史》。臺北：博雅書屋，2009。
小野一一郎，《近代日本幣制と東アジア銀貨圏——円とメキシコドル》。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0。
小葉田淳，《日本の貨幣》。東京：至文堂，1958。
北山富久二郎，《臺灣に於ける秤量貨幣制と我が幣制政策——銀地金を流通せしむる金本位制》。東京：巖松堂書店，1935。
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台湾》。東京：岩波書店，1988。中譯本：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臺北：帕米爾書店，1985。
東嘉生，〈清朝治下臺灣の貿易と外國商業資本〉，《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政學科研究年報》第 3 卷，1936，臺北，頁 319-396。
東嘉生，《臺灣經濟史研究》。臺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社，1944。
宮下忠雄，《近代中国銀両制度の研究——中国幣制の特殊研究》。東京：有明書房，1990 重印本。
濱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
Atwell, William S. “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1650.” *Past and Present* 95 (1982), pp. 68-95.
Bethell, Leslie,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vol. 3*: From Independence to c. 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Cannan, Edwin, intro. *The Paper Pound of 1797-1821: A Reprint of The Bullion Report.* London: P. S. King & son, Ltd., 1925.
Chaloner, W. H. “Currency Problems of the British Empire, 1814-1914.” In W. H. Chaloner,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Selected Essays*, pp. 271-300. London: Frank Cass, 1990.
Chan, Kai Yiu.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Periodical Publications of the Maritime Customs in Southern Taiwan, 1863-95.” *Asian Research Trends New Series* 13 (2018), pp. 51-70.
Chan, Kai Yiu. “Euro-American Silver Coins in the Pre-Nineteenth-Century ‘Prefectural City’ of Taiwan.” In *Nanying History, Society and Culture* V*: Early Tainan Region* (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 V：早期南瀛), edited by Liu Yi-chang (劉益昌) and Ann Heylen (賀安娟), pp. 221-285. Tainan 臺南: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of Tainan City Government 臺南市文化局, 2019.
Cohen, Paul A.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Crouzet, François. *Britain Ascendan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Franco-British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Davidson, James W.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History, People, Resources, and*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ommercial Prospects, Tea, Camphor, Sugar, Gold, Coal, Sulphur, Economical Plants, and Other Productions. London: Macmillan & Co., 1903 /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reprint, 1992.

Edelstein, Michael. *Overseas Investment in the Age of High Imperialism: the United Kingdom, 1850-1914.* London: Methuen, 1982.

Fairbank, John K. "The Creation of the Treaty System."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2,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I, edited by John K. Fairbank, pp. 213-2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Faure, David. *The Rural Economy of Pre-liberation China: Trade Increase and Peasant Livelihood in Jiangsu and Guangdong, 1870-1937*.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Feuerwerker, Albert. *The Foreign Establishment in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6.

Foreman-Peck, Ja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Econom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since 1850*, 2nd ed.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5.

Gardella, Robert. "From Treaty Ports to Provincial Status, 1860-1894." In *Taiwan: A New History*, edited by Murray A. Rubinstein, pp.163-200.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

Hall, A. R. *The Export of Capital from Britain 1870-1914*.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68.

Hamashita, Takeshi. "Foreign Trade Finance in China, 1810-50." In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Ming-Q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edited by Linda Grove and Christian Daniels, pp. 387-435.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4.

Hao, Yen-p'ing.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Hsiao, Liang-lin. *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1864-194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1974.

Kann, Eduard. *The Currencies of China: An Investig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Transactions Affecting China.* Shanghai: Kelly & Walsh, Ltd., 1926.

Kindleberger. Charles P., *A Financi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Kuroda, Akinobu. "Concurrent but Non-integrable Currency Circuits: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s among Monies in Modern China and Other Regions." *Financial History Review* 15, no. 1 (2008), pp. 17-36.

Lin, Man-houng. "Economic Ties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1860-1895: Strengthening or Weakening?" In *Tradition and Metamorphosis in Modern China, Symposium in Commemoration of Prof. Liu Kwang-Ching's 75th Birthday*, edited by Hao Yan-p'ing and Wei Hsiu-mei, pp. 1067-1089.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inica, 1998.

Morgan, E. Victor. *A History of Mone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 1965.

Murphey, Rhoads.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Officer, Lawrence H. *Between the Dollar-Sterling Gold Points: Exchange Rates, Parity, and Market Behavi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ollard, Sydney. *Britain's Prime and Britain's Decline: The British Economy 1870-1914.*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9.

Remer, C. F. "International Trade between Gold and Silver Countries: China, 1885-1913."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40, no. 4 (Aug. 1926), pp. 597-643.

Shiroyama, Tomoko. "The Shanghai Real Estate Market and Capital Investment, 1860-1936." In *Treaty Port Economy in Modern China: Empirical Studie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edited by Billy K. L. So and Ramon H. Myers, pp. 47-74.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11.

Tai, En-sai. *Treaty Ports in China (A Study in Diplom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18.

Wilson, Charles.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Historian: Collected Essay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65 (Jun. 2020), pp.115-168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2006_(65).0004

Silver Movements and Trade Performance of Taiwan (1865-1895)

Chan, Kai Yiu*

Abstract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Taiwan has been focused on the commodity trade, specific industries, trade networks, and the state policy on trade performance. Less emphasis has been put on the issue of silver in Taiwan's economic history, particularly on its role in assessing the island's trade performance. This paper examines Taiwan's Maritime Customs documents during the Qing period in order to provide an overall assessment of the trade performance of the island. To conduct such a research,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rade statistics of the island from its opening to external trade in 1865 until the conclusion of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in 1895. The documents under review show that, when the value and flow of silver are considered, the island's trade pattern cannot be understood by simply making contrasts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Rather, by reconsidering the value and flow of silver, we may outline the economic structures hidden behind Taiwan's multi-layered trade and capital movements within and without the island.

Keywords: Silver, Gold, Trade Performance, Capital Account, Maritime Customs.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o. 1, University Rd., East Dist., Tainan City 701401, Taiwan (R.O.C.);
E-mail: kaiychan@mail.nck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No. 65, June 2020

Silver Movements and Trade Performance of Taiwan (1865-1895)

Chan, Kai Yiu

offpri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